

黨國要人

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下〕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黨國要人

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編 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8 22978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1928

黨國要人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下編

三民主義之認識

一、三民主義是以博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進化定律爲總樞紐的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看出兩個要點：（一）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爭生存爲中心的；（二）由爭生存這個中心，分演出各種的進化現象和事實，由進化的定律，分演出民族同民族爭，國同國爭，國內人民同君主爭，勞動家同資本家爭的種種現象和事實。這兩個要點，站在進化定律的立場看，是一貫的：這是先生的歷史觀。所以依先生所說：人類在世界進化中爭生存，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人同人爭，一定要到大同，才能解決。

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所發生的爭多得很。舉其最著者，如君權與神權之爭，君主

與貴族之爭，君主與人民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之爭，國與國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這許多鬥爭，並不是在全部歷史上分了顯明的階段的。許多著名的史家，因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把這種種鬥爭，分做由神權與君權之爭，到君權與民權之爭，再到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的階段，這是不甚正確的，易引起誤解的。孫先生的學力之偉大處，就在於能把這種淺狹的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看破，而一口道出各種鬥爭的聯屬性，總括的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君權與神權之爭不過是佔一極小的部分，推而至於民權與君權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也都不過是各佔一部分。只拿一種鬥爭去解釋歷史，不但不足以盡人同人爭的全部，而且會走到和世界進化相反的末路上去。簡單的說，各種鬥爭，在歷史上有時是各別的發生，有時是混同的發生，有時是間斷的發生，有時是片段的發生，這都是由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所決定。但是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還不過是各種各別的鬥爭的枝節因緣，而非全部人同人爭的總因緣。人同人爭的總因緣，就是以爭生存為中心的進化定律。

孫先生將歷史上各種各別的鬥爭，歸納為三種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這

三種革命，可以包括所有的歷史事實，故亦可以括盡人同人爭的內容。而且，在歷史上，三種革命也沒有什麼顯明的階段可分。我們只要取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史一看，就夠證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是常常同時并起的。但是世界的學者，都是就一種革命的要求而發爲革命的思想，如盧梭天賦人權之說，專重民權運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專重無產階級運動，可爲明證。孫先生獨能超越於任何一種革命之上，而創立一個嶄新博大的三民主義，這是先生最偉大的所在。先生看到人同人爭的歷史的行程，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由比較的各別發動而趨於混同發動，由比較的和緩演進而趨於急激展開，由比較的涉及於少數人而趨於涉及於大多數人。所以先生創造三民主義，就是應合這種歷史的行程，而成爲一個整個的革命主義。世界上無論那一派的革命主義，在理論上固沒有那個能如三民主義的完備，在實行上更沒有那個能夠跳出三民主義的範圍，這就可見三民主義之博大了。

結論：爭生存是進化的中心；進化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三民主義是以世界歷史的中心爲綱領，其範圍則爲過去現在未來人同人爭的革命運動所莫能外。

二、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

現在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同時急進化的時代，其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充滿了世界歷史。從前各國有解決了民族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權民生問題；有解決了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縱有解決了民族問題或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也是落空。就時間上說，自古以來的世界，是這三大問題遞嬗堆積下來至今還未解決的懸案，尤其是到了現在必須一同解決的懸案。

就這三大問題亙古久懸不決一點上看，這就是需要世界革命的世界；就世界革命所要求解決的三大問題看，這就是三民主義的世界；更就三大問題成爲整個的連環的懸案看，現在就是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最需要的時代。在這個時候，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必須保持首尾相顧之關係。換言之，各部革命要保持世界革命的統一性，但同時不要失却各部革命的特殊性；反之，世界革命要保持各部革命的特殊性，但同時不要失却世界革命的統一性。這個條件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大關鍵。

能夠適合於這個條件，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

大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行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是最適用的，最切合的。

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

(一) 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

二) 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爲虛僞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 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

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

結論：世界各國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有同時解決的需要，是爲世界革命的目標；三民主義因其連環的內容和關係，爲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

三、以三民主義批評其他主義

三民主義的整個性和連環性，既如上述，我們就可站在它的連環性上面，來簡單的批評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弱點了。

(一) 國家主義，沒有世界革命的資格，自不必說。固然，在求國家之自由獨立一個目的

上，它也是要抵抗強權，因此它就可以牽合到民族主義的底下，但它却不是民族主義全體，尤其不是整個的和連環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全體，而況事實上發展到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那種國家主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表。所以國家主義，一行到國際上頭去，就發生毛病，卽近代談國際主義者也要反對，何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其最終目的是做到世界主義的，還能夠不反對它麼？於此我們就可以說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

至於在走偏到帝國主義一條路上去的一點上，國家主義簡直要變成民族主義的敵人了。

(二)無政府主義的最終目的爲無治，爲大同，與三民主義目的完全一樣；但其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實現大同的方法。它有世界革命的願望，却無世界革命的方法與行動。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比無政府主義更博大，與無政府主義有同一之目的，而其方法則爲無政府主義之所無。因爲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由權與能之分開，由打破強權就可達到平權，由平權就可達到無權，無權就是無治。再加上三民主義之連環的實現，民族由平等而至無爭，民生由平等而至無階級無貧富，這豈不是世界歸於大同了麼？到了這一步，文化一定極優美，道德一定極高尚。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

義的實行。

(三)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這幾年被俄國和第三國際採用得來，倡世界革命，便成了流行一時的舊骨董。但以馬克思主義爲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論，其最大弱點有二：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夠。不新不夠，所以就沒有成績。何以不新呢？馬克思的主義，是就七十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所下的結論，不是就世界進化現象全部所下的結論，所以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適用的。何以不夠呢？馬克思處處不肯失去其科學方法，這是他的好處，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學方法，就證明其爲不夠。因爲他的科學方法，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經濟生活演進的一段，這是時間的限制；研究的範圍，只是歐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這是空間的限制。馬克思充其量不過是世界革命的學者之一，他的主義那能比得上包羅全部歷史事實和應合世界進化定律的三民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不夠的第一證明。馬克思的第二國際之祕奧，全在拿階級鬥爭的縱的結合，去衝破民族鬥爭的橫的結合，所以他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歐戰時，第二國際更倡「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但第二國際統轄下的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大多數都爲贊助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失節，第二國際即因以瓦解。這可證馬

克思一派人不懂民族主義的失敗。俄國革命，祖述馬克思，但是同時列寧就於馬克思「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了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列寧的本意，在以階級的革命為主，而利用東方民族革命為輔。這是列寧比馬克思懂民族主義的地方，而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和第三國際之所以能夠維持到今天，還是為此。列寧在階級鬥爭之外，加用一點民族主義，本來已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一派人却辯護說，這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義，正足證明他們非承認民族主義的事實不可。

由馬克思和列寧兩派的經驗，便得兩個教訓：第一，歐洲階級革命便不行；第二，東方民族革命才行。但是俄國現在的列寧主義者還沒有覺悟，還沒有領悟這個教訓。因為第三國際還想借帝國主義的本身和對象以統治東方各民族革命；這正足證明其還沒有認識民族性之全部重要意義。總括的說，馬克思是不懂民族主義，致有第二國際之失敗；列寧懂了一點，遂收了多少革命的成效；現在第三國際由不懂民族主義而至於傷害東方的民族性，其錯誤必與馬克思同，其不足為世界革命的基礎亦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夠的第二證明。是後，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是不願要民權主義的，因為它所要的是無產階級獨裁。民權主義的本意是自由平

等；在世界革命的立場看，是沒有絲毫惡意的。但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一定要把古代希臘的民主和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拿來做攻擊民權主義的材料，并且以此就來襯出獨裁是真的，民主是虛偽的。這一點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但是馬克思派又不肯老實說獨裁是真的，還要拿「民主集權」「以階級獨裁消滅階級」一類的話來做掩飾，這豈不是承認民權主義是政治的極則麼？再就他們解釋階級獨裁的內容而論，說老實話，就是求一個階級的民主而壓迫其他民主，還不是承認了民權主義麼？馬克思派一方面攻擊民權主義爲虛偽，一方面又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是一個大矛盾；一方面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又只接受民權主義的一小部分，是一個大弱點。但是在世界革命的需要上，不接受民權主義的全部，便不足以領導世界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不夠的第三個證明。由此三個證明，我們更下一個總結論，就是：共產主義在基本理論上不懂民族主義和不要民權主義，是犯了不夠做世界革命基礎的幼稚病；在實際活動上却只接受了一點點民族主義和一點點民權主義，故其結果，最多不過做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哪能配談世界革命？既幼稚而又不澈底，便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都不行。何況馬克思爲共產主義定下的結論，是七十年前就一時一隅的經濟現象

所定的，已是陳腐不適用，怎能用以實現世界革命的目的呢？孫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句話正因先生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全然不行，只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共產主義所指向的目的。不懂三民主義且不懂共產主義的人，把先生這句話當做共產主義的護身符，實屬大錯。要曉得凡是講世界革命的人，最終目的，一定是相同的；但是方法不同，就關係重大了。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得通的，誰就是真正世界革命者；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不通的，誰就是不革命者，甚且誰就是反革命者；所以孫先生「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一語，實不啻把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打倒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上去，而一般人還想拿先生此語作護符，這真是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醜態！

結論：國家主義，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上為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實上發展成為帝國主義，其病在偏為民族主義之下的右派。無政府主義，在企望人人自由平等人人無權無爭的理想上為民權主義的左派，而其病在於無實行的方法。共產主義，在階級革命和階級獨裁的理論與方法上，其病在幼稚；在不認識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於世界革命為需要的全部意義上，其

病在不澈底強暴行之，且有自趨於反革命一途的危險傾向。

四、總結論

從以上簡括的說明，我們更作一個總結論，就是：人類以爭生存為中心，而爭生存就是世界進化的中心。從世界進化的行程，自古以來就生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革命者的唯一任務，即在於了解此三大問題之所從出，依其需要解決的企望，和客觀的實際所備具的條件，定出一完備的革命主義，以求全部澈底的解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即本此議而創立，故其博大悠久的適用性，古今中外實無倫比。馬克思主義，固不失為一種富有革命性的學說，然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未能了解歷史的真正重心，遂失其領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能糾正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觀念之錯誤的，最近固有一派，如美國學者威廉氏，即其一人，但其短處在昧於世界革命的急切需要，而不知世界進化實有日向激急的革命化之趨勢，故其學說不能逃缺乏革命性的批評。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則兼具兩派學說之長，而無其短。這就可知先生眼力之偉大，學力之偉大，魄力之偉大，革命性之偉大。許多人以為現在只管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大家已死在地下，共產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橫豎管不到的，何不等後來人去爭個解

決？說這種話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懂得爲什麼有革命的需要，沒有懂得革命爲什麼要主義，更沒有懂得我們的世界是什麼世界，所以他根本上把國民革命看做一回事，世界革命另看做一回事，這哪裏是忠實的革命者？哪裏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哪裏是孫總理的信徒？我們是中國國民黨員，都應該了解 總理的歷史觀和進化觀，都應該了解 總理的主義之出發點和開展線，然後纔能了解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一致，纔能了解各部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必須爲三民主義的革命。凡我同志，當急起注意。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一、世界反革命的勢力

現在的革命，無論世界的，抑或部分的，很顯著地要掙擊的目標是相同的。這目標，分別說，一曰軍國主義，二曰寡頭政治，或虛僞的和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曰資本主義；總括說，就是帝國主義。分的爲求各民族平等的生存，總的爲求世界大同，都要打破這三個反革命勢力或其總結品的帝國主義，纔能造起新的基礎。

軍國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所以成爲現今革命的三個障礙，就是因爲它們互相關連的

成了三位一體的罪惡。人類供這三位一體的罪惡展轉相循之犧牲，已經有五百多年，而全世界三分二的土地和人口，到現在都受着了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之支配。以人口和面積論，英帝國主義的成就，實居俄法葡荷比意日美諸帝國主義之冠。若單以人口爲比例，英帝國主義所統制的各種屬地的人口有四萬萬一千七百萬，平均英國的男女老少，每人有黃櫻黑各種的屬地子民十人。若單以面積爲比例，法帝國主義的各種屬地共有四百一十三萬六千方英里，比法國的面積多了二十倍。葡萄牙雖然在各帝國主義當中爲最弱，却也有九十三萬六千方英里的殖民地，較它本國的面積，多了二十二倍。比利時，在各帝國主義當中爲最小，却也有屬地九十三萬一千方英里，而它的本國面積不過是相當於八分之一。這些例，就可證帝國主義的勢力，靠着軍國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三種桎梏，把人類大多數細縛起來了。

要是追尋一個解釋的根源，我們可以採用個人主義爲說明這三種反革命勢力的基點。因爲，如果我們暫且把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的一面保留在後面來說明，則我們這裏可以說，帝國主義的內心，完全是個人主義中支配慾之擴大。所謂支配，就是把自己的慾望壓倒他人的慾望，自己的權力壓倒他人的權力，自己的生存壓倒他人的生存。這種支配慾最易活動的處

所，無過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在社會的公共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裏面，纔有支配人們的最大機會。我不是說政治和經濟的生活當中，只容許人們的支配慾發展而不容許其他人性的發展。科學家政治家的創造慾，離了公衆的具體生活問題，就再沒有造福人類的處所，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但是最足誘惑支配慾發展的，也是政治和經濟。在封建時代，支配慾的表現是貴族爭雄，諸侯爭霸，土地兼併，豪強侵奪。到了近代，支配慾的表現，便更充實的組織化，其裏挾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力量結晶起來，便是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這三個東西。

第一，軍國主義。它是強大的國家武力組織，其作用在於屈服本國人和外國民族，迫到它們違背自己意願而供它的犧牲。以前十七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以為到了資本制度全興的時候，戰爭和驢武主義都自然而會消滅。這種迷信樂觀主義者的預言，却沒有顧慮到機器一經應用在工業上面來了以後，一般野心的個人和國家都拿經濟的力量和工具做擴大陸海空軍權的主要根據。這種武力擴大的趨勢，不久就成了一種支配人們的桎梏而軍國主義就成了一種變相的野蠻主義。人類本來是用武力以自保的，但是軍國主義的武力是用以侵害人的：武力用得其當，就可以禦暴而衛弱，可以保障權利，可以擁護公理，但是武力一到了軍國主義

的形式，它就不問正當不正當，都是要濫用，而一國的執政者，甚至國家本身，都變成暴力的犧牲者。這種事實，在國際文書上，也就居然公開的承認，所以民族和民族間，國家和國家間，自己要分別的說你是幾等幾等的「強權」；如果它們結條約，它們就要自稱「締約的強國」；「遇着它們聯合的來壓迫什麼弱小民族，它們就成了「同盟的列強」；而它們彼此相對的關係，就叫做什麼「列強的均勢」或「國際聯盟」！一個國家到了能用強大的海陸飛行軍表示威武之際，它縱是從前非常微弱，現在也要尊稱「大強國」！人羣間的接觸往來，到了不以人之所以為人的共同性做標準，乃以武力的強弱做標準，而少數國家獨自稱曰「大強國」，這實不啻顯示國際關係間一切新舊道德之絕滅。孟德斯鳩在十八世紀中葉，也就曉得說：「現在一種新病症已經傳播於歐洲；它纏擾到我們的君主，使他們成立了無限制數量的軍隊。這種病症自有其危險性，而且一定會變成流行病。因為只要一國增加了它的所謂武力，他國也馬上就要增加它們的。所以，沒有一國得到好處，只是大家陷落在共同的絕境。個個君主都怕他的子民有滅種的危險，所以都把所有的武力設備起來，於是這種大家互相對抗的軍備競爭，就叫做和平。」孟德斯鳩的話，到現在還是適用的。只看現在世界所謂幾大強國，哪一個不是沉迷在

軍國主義之中，它們哪裏不是兢兢於維持其互相擴充兵備的和平？它們爲什麼如此呢？自然，掠奪他民族的土地和財源，是它們軍國主義的顯著目的。但是同時，民族間之互相猜忌，執政者尋求名譽和虛榮之野心，不同血統的種族間之互相仇恨，乃至一般宣傳文化者之欲強迫未開化民族接受其自視較高的文化，都是和軍國主義有不解的因緣。總而言之，自從人有了支配慾作祟，什麼宗教問題，種族問題，經濟問題，都可以利用得了做發揚軍國主義的導線。所以軍國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支配人的強有力的武力組織。

第二，資本主義。簡單一點，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個人利用財產做支配工業商業財政和政治的工具，而這種支配的範圍，不獨施之於國內，抑且施之於國際。在農產社會時代，財產支配力還不十分橫暴。可是經過十五十六兩世紀的海航進步，東印度和美洲的海洋交通既開，和機器生產制開始立下根基而後，財產遂變爲權力支配的中心。什麼商業，製造業，航業，財政，鐵道，和大規模的組合事業，到處都以資本主義爲原則。在這種種事業中，個人主義的支配慾乃大大的獲得滿足發展的滋養料。於這種社會當中，多少人拿着資本制度做工具，便可支配其他多少人或階級的生產力，而所得的結果，就成了他們自己不必下相等勞力而歸他們私人享

用的財產。本來，財產也是和武力一樣，本身並沒有什麼惡處。人如果不求生存則已，要生存就須得有一部分適用的物貨來養活。而且人在文明的社會裏面，不但是養生的物質，就是足以供節省勞力的工具，也是不可少的。無論是誰，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應該對於天然界的財源，對於人爲的需要品，對於人類智識的總體，都要有一分，纔能實現他自己的創造力。總言之，要在機會平等的世界裏求自由人格的生存，一分財產的使用權是非有不可的。但是像資本制度底下的財產，就不只是培養個人創造力的工具，乃是支配人們的工具，或僅僅是滿足個人佔領慾的工具。只要你參加到資本制度裏面去，不管你是生產者也好，資本家也好，你一心一意所企求的是要爲你個人一方面獲利益，你的勞力既非爲創造而勞力，你的生產品也就並非爲人們服務而生產。若論各人共同對於生產上貢獻了相當能方就取得相當的報酬，不管報酬的形式是工銀也好，租金也好，利息也好，贏利也好，只要這種報酬用意在於保養全部生產事業當中勞心勞力的分子的生產力，這未始不是一種很經濟的方法。然而資本制度底下的浪費和種種不勞而獲掠奪，則完全是個人主義支配生產的惡果。要是生產事業實際上一天受着個人主義的支配，則支配者必一天只是爲自己獲利打算，決不會爲人類幸福上謀最經濟的生

產和分配打算。只要支配者一天爲自己獲利打算，而不爲人類最經濟的生產和分配的福利打算，則爲社會而生產的原則，和爲獲利而生產的原則，便一天不能調和，而少數人假經濟的力量以支配大多人的現象，便一天不會中止。

第三，官僚主義。無論何國，官僚幾成一種通常而永久的特權階級。官僚主義，論其只講究政權的因襲而且只求維持其特殊勢力於不替的特點，它是一種傳統的職業；論其本身不事直接的生產，唯謀操縱政柄而爲各種特殊利益的工具，它是一種寄生的勢力；論其裏挾立法司法行政各種事權，佔取一國吏治上下交連的系統，而一切濫權罔法徇私包庇舞弊的勾當皆所優爲，它是一種掠奪的制度。這種以官爲業的制度當中的人，自有其特異的心理。他們自己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或社會利益，但是代表其他特權階級的利益，便是他們的利益；他們自己沒有治國經世的主張或理論，但是阿附人家已成的理論，尤其標竊民心所歸的現成主張，便是他們的主張；他們爭選舉爭政權時也有政綱政策，但是他們口裏所講的和手裏所做的是不一樣，而心裏所想的和口裏所講的更不一樣；他們所着重的只有戰略。也許有人說這是說到共產黨了，但是講戰略的官僚政客，古今中外都老早很普遍，而共產黨還不過是拾其餘唾。他們

的戰略專以維持個人權位的升降做出發點，換言之，就是以做官爲出發點。他們崇拜權威，崇拜金錢，崇拜武力，崇拜對外侵略。因此，絕對的國家主義，黷武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都是他們的宗教。他們崇拜這些，不只是迷信，而且是利用。在羅馬帝國全盛的時代，羅馬的官僚階級強逼人民要崇拜羅馬帝國如上帝。羅馬帝國是不可分的，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近代普魯士主義之下德國官僚，尊崇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也有同樣的神氣。就是現在英日各國的帝國主義崇拜者，又何嘗不是一樣。他們都對一般人民這樣的想着：我們就是帝國主義的柱石；我們扼守自己的海關，洞開他人的門戶，擴充強大的海陸空軍，佔住各洲的殖民地，鎮壓一切弱小民族的喧鬧；這纔是我們的偉蹟和威權，你們還敢不懾伏麼？如果你們要反對我們，便是反對國家的權力；你們須得向我們起敬，得得肅靜，須得懾懼！

這就是古今中外官僚階級的最高思想。在這種最高思想基點上，軍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都是同官僚階級沆瀣一氣的。他們簡直是心心相照的連合在一起。除了這三種惡勢力外，還有什麼國家主義保守主義干涉主義保護主義等，都和它們息息相通的。自然而然地，什麼法律家宗教家教育家慈善家新聞記者各種守舊的勢力，都和它們做了同盟。這些守舊

的勢力，我們不暇再來分析，但就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三者而論，我們已分析夠了。這三種主要的和其附屬的各種反革命勢力，其間不知有多少複雜的連環關係。現在還須明瞭它們的連環關係，然後可以洞澈今日國際帝國主義就是它們相互促成的集合體。

二、世界反革命勢力之連環

我們已經明瞭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幾種主要反革命勢力的共同點，是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支配慾。但是且讓我們再來看看這些反革命勢力的連環性。

官僚資本家和軍閥，根本上氣味相投，這是很顯明的。官僚，不管他是佔國會前席的政治家，或閣員，或議員，或各部行政官吏，或政黨的政客，他們的政策和主張，都不是着眼於人民全體的幸福，而是着眼於鞏固他們的政權。要鞏固他們的政權，遂不能不引資本家的勢力為後援，而政策和主張，遂亦不能不靠資本階級的利益來決定。他們要控制本國的商場，要保護地主，商人，製造家，和財政家，要實行保護稅制，以鼓勵本國個人主義的生產事業；為的是必如此他們的後援勢力纔能日見雄厚。他們支配選舉，任命官吏，為的是要選擇可以溝通經濟階級的人來佔取議會和地方行政機關。他們直接間接支配一國的教育機關，言論機關，所為的是要製

造有利於特權階級的思想習慣，以防止人民對於彼等發生危險的反抗，纔能維持他們官僚和資本家的勢力。這些事實，都表明官僚主義者乃息息通脈於資本主義者，而離却資本主義者的利害感情，便沒有站得住的官僚。通常歐美各國一般人攻擊政府官吏閣員議員輩代表資本家的利益，而我們就常常聽見此輩不肯自承，但是近代歐美政治組織，完全是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則不必是馬克思主義者也都一致的公認。在各國殖民地政府中的官吏和屬於外交系統之下的領事官商業參贊之類，尤其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是純粹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官僚階級。所以官僚主義直接勾連於資本主義，是極顯明的事實。

官僚主義直接通連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則直接通連於軍國主義，尤其是近代歷史中彰明較著的線索。資本制度未發達的時候，一個國家要實行全國皆兵的制度去向外侵略，是財力上不可能的事。但是近代資本制度發達了以後，個人主義的大生產，固然增加了一國的經濟力，同時也增加了一國的戰鬥力。資本主義，在它的特質上，需要盛大的軍備為後援，而且依賴盛大的軍備為前導；要是不然，資本主義便在國內不足以防患，在國外不足以進取。固然，軍國主義者本身好大喜功，自有其獨立的企圖，然而黷武主義發展，資本主義也就佔着了利益。

當德意志帝國新興時，普魯士的統治階級實行軍國主義，而舊的封建制底下的地主和新的生產制底下的資本家，都竭力舉剩餘的財力以贊助德意志軍國主義之進展，所為的是地和主資本家都需武力來保護他們在國內的利益，都需武力去向國外發展，同各國的資本主義競爭。真的，凡是資本主義者，因為都要利用軍國主義者去奪取原料和開闢市場，就樂於予軍國主義以物質上的供養和精神上的鼓勵，這固不必德意志的地主和資本家纔如此的。英法意各國的殖民競爭史，總言之，實是資本主義者利用軍國主義者最得力的成就。資本主義者掠奪殖民地的方法有兩種。其一，資本主義者組織私人經營殖民地之公司，如東印度公司，南非洲利加公司，東阿非利加公司等，欺騙弱小民族的君主或酋長，或以條約，或以合同，或以金錢，取得某一領土內的經濟權之後，遂在其地設立殖民政府，將其主權漸漸侵蝕過來，而這種經濟侵略，同時就帶着一切軍國主義行動的因緣進來。其二，如果用不到締結條約或收買的地方，資本主義者就施用移殖僑民的方法；等到僑居商人漸漸增多，這便穩定了武力割取的根基。英國之於印度，埃及，南非洲等地，法國之於突尼斯，安南等地，從前德國之於非洲東部及其西部等地，就是施用第一種方法的例證。英國之於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以前德國之於喀麥隆，多哥蘭等

地，便是施用第二種方法的例證。日本對於朝鮮南滿等處，則兩種方法是同時並用的。在各國殖民史的歷程當中，往往資本主義首先向外發跡，而軍國主義隨之以進，這是資本主義直接勾連於軍國主義。只要資本主義抓着一塊可以發展的土地，軍國主義就很容易尋覓把它征服下來。但是在軍國主義方在躍躍欲試的以前，外交家政治家們早已對於那一塊土地內的人民和政府，高唱『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侮辱了我們帝國的尊嚴』、『要教訓那些野蠻民族來認識白種人的文化』種種挑戰的言論和政策，都喧嚷起來。這便是軍國主義復直接勾連於官僚主義。由官僚主義又通連到資本主義，便回復到我們前面所說的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沆瀣一氣的關係，而完成我們所要分析的大連環。

三、帝國主義是反革命勢力連環的結晶

這一切，都不過將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三者的連環性作一大體的說明罷了，還不是精深地分析。但是這樣一種大體的說明，正是爲下面精深的分析作一點準備。前面已經說過，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三者，總合言之，就是帝國主義。所以我們要看這三種反革命勢力的連環性，最緊要的是要考察這三種勢力在帝國主義的結晶上是有若何的相互

關係，換言之，就是要檢查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如何，內容的性質如何。

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實隱伏於十五世紀歐洲各國向海外尋求殖民地的運動。在那時候，歐洲情形，經過了幾百年十字軍的戰爭而後，上層階級已是財力竭蹶。然而內部各國專制君主，仍是自相攻伐，斂財養兵。他們養兵而外，還要窮奢極慾。同時，意大利和沿地中海等處的城市漸漸勃興，而當時最有利的商業，就是金銀香料食品等物。但是金銀的原料歐洲已告缺乏，而香料食品是由東方輸入的。意大利處在地中海的中心，所以它就扼着歐亞交接的咽喉，而當時敲剝歐洲各國君主貴族僧侶軍人平民的唯一商業民族。各國君主主要免除內部的窮乏和意大利商人的剝削，於是就急望另求金銀礦的新地，和直接與東亞通商的新航路。葡萄牙首先在尋求新航路一方面成了功，因為它的航海家於一千四百九十八年繞過非洲的西岸，南經現在的好望角，直抵印度，裝載了香料食品等物回來。自是葡萄牙人對於這條航路的商業就專利起來，和地中海專利的意大利商人競爭；葡萄牙王遂密派艦隊保護葡萄牙商人在非洲沿海波斯海灣印度沿海都設起商埠，荷蘭，英國，法國等處的商人，都向里斯本的葡商販買貨物。葡王每年所收入的商品稅額，據說有七八十萬磅，而葡國的貴族官僚商人都一天富似

一天了。各國君主看到葡萄牙開了致富之路，當然不肯讓人。西班牙自一千四百九十三年就發現了美洲的金礦，終十六世紀西班牙宮庭的財富，西班牙王國的威權，在歐洲各國當佔一個極重要地位。荷蘭自一千六百零二年設立東印度公司後，無新航路可關，就把葡萄牙的非洲好望角商業權搶奪而去，從此遂壟斷東方和東印度羣島的商業。英法兩國，殖民地的發跡雖稍遲，然而天天總想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海外利益而代之，於是加拿大東部和美洲中東兩部的殖民經營，也漸漸興起。所以我們要明白後來帝國主義所以有伸張的地盤，不能不推始於十五世紀以來航路的發跡和新領土的發現。然而沒有當時各國君主的窮奢黷武，便沒有十五世紀那種航海的競爭，沒有這種殖民競爭，便沒有相因而起的商業競爭。只要從這一段歷史的因緣看起，我們就曉得帝國主義在它發源的時候，已經有貴族軍人商人三種勢力為推進機了。

但在當時沒有取得壟斷東方航路權或沒有取得金銀礦地的國家，要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競爭，便不能不另求所以致富之方。譬如法國，在當時就是不能和葡荷等國競爭的，它就要另想方法，講求自足的國民經濟。十七世紀法國政治家黎塞留 Richelieu 就是主張自

足的國民經濟的人。他主張法國必須要自造本國所需的商品，而不必靠荷蘭等國之輸入。

他以為要這樣，法蘭西纔能夠『吸收他國金錢。』和他懷抱同樣思想的，有當時歐洲經濟學

家約翰底韋特 John De Witt，勒黎 Raleigh 蒙克里夫 Monchretien 蔡爾德 Sir Joshua Child

諸人做代表，而其所主張的中心思想，就是『殖民地，商業，製造業，三者缺一，即不足以富國強兵。

』這種思想之普遍，可以實證於英法瑞典丹麥各國之向海外尋求殖民地，扶植航業，獎勵工業，發展對外貿易。在法國魯易十四一代，著名的苛爾伯特 Colbert，尤其是以國家的力量扶

植本國工商業和殖民地發展最力之人。十七世紀這種以國家專制的權力作殖民競爭航海

競爭工商業競爭的歷史的潮流，在法國遂得了苛爾伯特主義 Colbertism 之稱，而通常經濟史

上所謂商業主義 Mercantilism 者，就是指此。這種商業主義，背後挾着君主專制的權力，而

且還有國家的財力和軍力做後盾，其結果便非純然為蠶金式的葡萄牙西班牙海外商人所能

抗爭。簡單言之，十五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向外經營，其目的不在殖民，而在販輸東方及西

方的貨物以售諸歐洲，或取得海外的金銀輦回本國。十六十七世紀的英法等國向外經營，却

是君主國家比較有計畫有組織的對外侵略。它們不但把本國的軍力和財力去殖民海外，而

且要在殖民地以內樹立政治宗教軍事經濟的一切基礎起來。英法兩國拿這樣的商業主義去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競爭，所以就一步一步把它們本來捷足先得的殖民地併吞了。我們不必將各國爭殖民地的經過敘述出來，然而即此足以使我們樹立一個根本論點，這就是：商業主義是十六十七兩世紀歐洲各國殖民的商業政策，而這種政策的發展，就成爲今日帝國主義的雛形。

然而商業主義沒有其他的力量來培養，也不會變成今日的帝國主義。要曉得十六十七兩世紀是商業主義的時代，同時也是開明專制發展的時代。當十六世紀的末葉，強國的君主政體是風行歐洲的。雖然德意志和意大利還被專制王侯割據而不能統一，但是西班牙實際上已成各國君主所傾慕的專制國家。英國詹姆士斯圖亞特 James Stuart 則公然宣言王權與上帝而俱尊，而英國君主之獨裁，亦以十七世紀爲特甚。將近十七世紀時，法國君主權力的伸張，且漸漸變爲歐洲各國的最大而最強者，這個時代的趨勢也可想而知了。這些君主都是野心勃勃而好大喜功的，而其操縱外交軍政的重要官僚，也往往抱着馬基雅弗里 Machiavelli 的思想，務以權謀術略以與他國爭雄長。當時君主與君主有爭，貴族與貴族有爭，而在英國則

平民和君主又有爭。各國君主既然都是黷武爲務，軍費較前更要增大，軍械軍餉的需要增多，而兵士也較前成爲一種固定的職業，非復如十五世紀以前未經訓練的游民了。除此而外，海上要增造商船和兵艦，——雖然都不如現在的精巧，——又要供給殖民地政府一切的需費。君主的耗費既然增多，所以就不能不更謀有效率的海外商業礦產之開發。因爲當時君主的耗費都希望取給於商業上的稅金，和海外礦產業上所抽取的贏利。這就可見純粹的商業主義之外，還有風行當時的君主專制；這兩種勢力展轉相因的關係，纔結晶而成後來帝國主義的基礎。

然而帝國主義，尙有待於十八世紀的機械發明，纔能繼續發展。以前歐洲各國雖感覺殖民地 and 工商業發達的必要，然沒有機器的生產方法之發明和應用，帝國主義就不能大踏步的猛進。十五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在海外首先獲得的殖民地，到十七世紀就大部分給君主專制最強盛的商業主義的國家英法等國搶奪去了；然而這些搶奪而來的殖民地還是不穩固，假使沒有十八世紀機械生產方法之發明再給它一個最有力的保障。英國是首先應用汽機的國家，而它的機器生產也首先發展。產業革命首先起於英國，從歷史的立場看，實非偶

然。因為產業革命，不啻為英國決定了一個殖民的工業的國家領袖的地位，從此以後，英國不但能夠鞏固已得的殖民地，而且能夠從其他殖民的國家奪取新尾閩，不但能夠求自己國民經濟的自足，而且能壓法葡荷等國的工商業，使它們不能不讓英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佔國際最強大的地位。當時英國差不多獨得機器生產新方法之秘，其他國家都望塵莫及，所以由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紡織棉紗鋼鐵等業，獨直沒有誰能同它競爭。甚至在一千八百七十年，英國所冶的鋼鐵，過全世界產額之半；它所產的棉織物，也差不多佔全世界產額之半；它的對外貿易，比任何競爭的工業國多兩倍。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法美德諸國新發展的工商業，經了長期的培植，纔忽然起來同英國抗衡。這時美國鋼鐵產額之銳進，竟佔第一位，而德國的產額也把英國壓在第二位。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間，美國對外貿易增加四倍，德國增到兩倍，而英國不過增百分之四十五。

這種新興的資本國家加入到殖民的商業的競爭裏面來，便發生重大的影響。英國的局勢，從獨霸的工業國的地位，現在進到同法美德諸國競爭的地位。它們彼此競爭，便引起了絕大的變動。在經濟上，它們要做生產過剩的競爭，資本過剩的競爭，交通壟斷的競爭，和更劇烈

的市場和原料之獲取的競爭；這一切競爭之劇烈，是從前英國獨佔工商業的時候所無的。這一個大變動的重要意義，可以拿十九世紀末葉以前英國的自由主義和十九世紀末葉以後歐洲的國家主義兩相比較，就能表現出來。從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起，亞丹斯密士 Adam Smith 發表他的名著『國民之富』；邊沁 Bentham 發表他的『道德和立法的原理』；李嘉多 David Ricardo 發表他的『經濟及財政之原理』；這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都主張放任主義，反對國家干涉私人手裏的經濟的生產事業。這個時候，政治上有底斯累利 Disraeli，葛拉德士吞 Gladstone，哥布登 Cobden，和伯萊特 Bright 輩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准許各殖民地自治；這都是力反以前殖民的商業主義的政策。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國獨立，實當時殖民的帝國根本變革的先導。繼其後者，有一千八百一十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的南美洲脫離西班牙獨立的革命運動。這些事實，所顯示的歷史意義，就是當時一種反乎十七世紀商業主義的離心運動，實在深入人心。杜爾瓜 Thuret 在十八世紀中葉有一句名言說：「殖民地如生長在樹上的果實，果到熟時，蒂就落了。」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加拿大發生革命後，英國對於殖民地也就一個一個的給它們以自治權。葛拉德士吞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也就說：「等到殖民地自己發

展到相當程度，它脫離母國而獨立，乃事實之所必然，不應相強也。」總括言之，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在英國獨佔了歐洲工商業的優勢之下，它的自由主義或放任主義，曾經一度的緊張，而從前由商業主義傳統下來的政策，如羈絆殖民地，保護稅則等，差不多一掃而空。但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後，這種自由放任的趨勢忽然中止，而歐美政治的經濟的浪潮，又回復到一種嚴重的干涉主義的地步，使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帝國主義，直接繼承了十七世紀的商業主義的傳統世界，這一個事實的大關鍵，就完全是由於十九世紀末葉美德法諸新興的資本國家之勃起。英國遇着這幾個機器生產的新國家起來同它競爭世界殖民地和工商交通投資事業的霸權，彷彿從夢中驚醒，遂竭力以求與各國相角逐。這種競爭一起，遂把所有的自由主義放任主義一齊攔開，而其他各國也就互相準備，以求角勝。在這個時候，各資本主義的競爭，便成了國家的競爭。半世紀以前，自由主義者主張個人主義的經濟事業，用不着國家來干涉，而現在則國家不但要來干涉個人主義的經濟事業，並且還要用權力來扶助個人主義的經濟事業之發展；半世紀以前，國家干涉個人主義的生產，大家就說是恐怕走上了帝國主義的路，而現在則各國的政治家不但怕他們的國家走上帝國主義的路，而且唯恐其帝國主義不成功。這一種由放

任主義到干涉主義由自由主義到帝國主義的大轉變，完全是十九世紀末葉三十年間發生的。不過三十年的時間，前後的趨勢就大不相同。這種大轉變是什麼東西促成的呢？是美德法各國新起參加資本生產制和殖民地發展的運動，和英國來互相爭衡這個事實促成的。因為這一個事實之促成，遂使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世界，一方面遠紹十七世紀商業主義的傳統，一方面也繼承十七世紀專制主義的精神；自是而後，一方面是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積漸強大，一方面是政治的帝國主義之日趨完成；前者是資本主義衝破一國的國界而壟斷全世界的生產，後者是資本主義的階級專政而防制他民族的民主運動；而二者的真髓，遂結晶成了一個風行於十九世紀以來的國家主義。我們只要看在前面所述的兩種歷史的趨勢正在開展的時候，歐美各國的國家主義的精神也是同時開展的。假使十九世紀後半期如果有所謂時代精神，則舍國家主義外是沒有第二個時代精神的。這個時候，日耳曼民族在俾士麥的赤血和黑鐵政策之下統一成德意志帝國；意大利由一個自羅馬末代以來分裂的民族而造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美國由南北戰爭的分裂統一成個完整的聯邦；自此以後，中央集權的思想戰勝，而哲斐生那種邦權超越國權的地方分權主義也從此失勢；俄羅斯開始實行它的俄化國家政策；波蘭的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的獨立戰爭，雖然失敗，但是於波蘭國家主義運動總得一個有力的證明。至若巴爾幹各民族的革命運動，引起近東百年來種種的風雲，法國經普法戰爭後國家主義的精神勃興，和奧匈聯邦內被統治民族的蠢動，都是國家主義同時開展的史例。國家主義，是以民族求獨立自主為其本意的，而帝國主義是以白種人征服有色人種為其本意的。這兩種主義，在理論上固有其不能相容之點，但是自有經濟的國家主義發展的事實做了十九世紀的重心，則本來求政治的獨立自主的國家主義，便很容易地轉為侵略他人或防制他人獨立自主的帝國主義。在這一事實的樞紐轉移的時候，歐洲的經濟學也起了轉變。從前代表自由主義和放任主義的英法正統派經濟學，如英國曼徹斯德學派等，現在就變為受一般國家主義的經濟學者之培植。代表這新興一派的國家主義經濟學的，就是德國李士特 Friedrich List。他的中心思想，力言自由主義之不當，而着重國家的永久性和整一性，從而推論國家的安全和福利，必須健全的經濟政策管理私人的工商事業。個人的利益必須聽命於國家的需要；所以保護政策，實為培植工商農業而使之平衡發展的必要手段。李氏這種學說，實與當日的時代精神相調協，所以他便成為歐洲大陸經濟學派的創始者。與這種學說同時風行的政治現象，

在勞動方面，起了勞工立法的要求；在資本家方面，有保護稅制的呼籲；在社會方面，有社會改良運動的勃興；這一切都是見露了帝國主義猛足的進展。可是經濟的和政治的帝國主義進展，軍事的帝國主義也進展。在英國，有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保守黨的握政權，而其領袖底斯累利則明白宣布帝國主義是保守黨的最大政策。英國控制蘇彝士運河，管理埃及財政，維多利亞皇后兼領印度女皇的頭銜，俾路支變為英國保護國，非洲德蘭士哇兒被英國併吞，英俄法三國對近東的干涉行動，這都是十九世紀末葉英帝國主義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最大成就。在法國，東方則兼併西貢交趾支那和安南，非洲則吞滅阿爾幾尼亞及突尼斯。德國俾士麥也同時向近東非洲遠東等處發展它的帝國主義。俄羅斯為要在帝國主義的路上競爭，亦盡力從波羅的海地中海及太平洋三方面尋求海口，直接與英法日各帝國主義周旋於政治的商業的軍事的鬥爭之場。而這些帝國主義的鬥爭，集總在中國一方面的，便有自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以來的種種侵略。這一切歷史的事實，總括起來說，都證明一切壓迫人類惡勢力皆結晶於面目猶怪的帝國主義。我們如果把上面所述這五百年來歷史的行程作一個總結算，就應該曉得在這五百年間佔最強盛的地位的，除帝國主義外，是沒有第二種支配全人類的力量了。

根據這五百年的歷史，帝國主義的性質也就很顯明。簡括地說，它是十五世紀的殖民運動，十七世紀的商業主義和開明專制，十八世紀機器生產方法之利用，和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所匯合而成的。它彷彿是一條大河，在時間上每次向前流了一程，便與某時代支配人類的强有力的制度方法和勢力相匯合；匯合的愈多，它這河流的泛溢力和衝進力亦愈大；到了今日，這河流的衝泛力幾於湮沒了全世界，而且這河水所含的污積物，亦有如海洋之水的一般鹹苦；人們在它浸淫沐浴之中，幾於尋不着超出苦海之路。但是帝國主義是人造的鎖練，人造的鎖練，終須人力來鉸斷的啊！

四、連環的三民主義打破連環的世界反革命勢力

依以上詳細的分析，我們曉得了反革命勢力的造成，經過五百年的歷史行程，其總結晶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核心有三個：一是軍閥主義，二是官僚主義，三是資本主義。這三個核心，在十五十六兩世紀發為各國的殖民競爭，在十七世紀發為專制主義和殖民的商業主義，在十八世紀發為資本的生產制，在十九世紀發為經濟的和政治的國家主義。到現在二十世紀呢，固然一方是五百年來積下的帝國主義佔領了全世界，然而一方在帝國主義的積惡之下也

養蓄了革命的潛勢力。這革命的潛勢力，雖然還沒有能夠表現完全推翻帝國主義的力量，雖然年齡還沒有帝國主義的多，但是至少也潛伏了三百多年，而全世界十五萬萬人當中，至少有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和這革命的潛勢力有份的。這種年齡尚幼而人數最多的革命潛勢力，只要得着適用的革命方法做指導，一定有掀翻帝國主義的最大可能性。在這三百多年的時間，革命潛勢力爆發過多少次。舉其最著的，第一次是英國革命，第二次是美國革命，第三次是法國革命，第四次是中國革命，第五次是俄國革命，第六次是德國革命，第七次是土耳其革命。在這些革命潮流湧進之中，有兩個重要意義是值得注意的。英國革命，克林威爾把查理士第一殺死，距美國革命一百多年；美國革命距法國革命則不過十年；法國革命後則全歐洲的革命思潮便一天盛行一天，推而普傳到東方各民族；中國革命則爲東方民族最先發動的，而我們革命不到六年就有俄國革命；俄國革命是歐戰所觸發的，而同時革命的就有德國和土耳其；這樣，歷史指示我們革命的勢力是進一步便快一步，愈到後來愈推進得快，這是第一個可注意之點。

英國革命只殺死查理士第一，而其君主政體，至今還保存着，在革命的立場說，真是毫無成績；美法兩國的革命，雖脫離了君主立憲那種最不澈底的軌道，然而還是階級的民主，有了階級政

治便是帝國主義的產胎；俄國革命雖然推翻君主政體打破資本階級，比美法兩國的革命確是進了一大步，但是理論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事實上的史丹林個人專政，最大限度也終不能逃過階級政治的批評，何況它的共產黨的帝國主義，完全沒有拋棄前俄帝國主義的精神；土耳其革命，單就目前的事實說，是脫了君主專制和階級政治的痕跡，而同時也沒有帝國主義的企圖，但是它的生產制度不會逼成將來的階級政治和帝國主義，此時還沒有多少事實給我們作精確的判斷；至於我們中國的革命，在推翻君主專制一點上，比美法的革命無遜色，在努力打破軍閥政治而使一切階級政治的基礎都建立不穩一點上，則比美法俄三國的革命都進步，而在依據三民主義的理論和計畫以求革命目的之實現一點上，則比所有已得多少革命成績的民族，都是最進步的，最徹底的。

何以中國革命必須依據三民主義而進行，何以三民主義是革命理論中最進步最徹底的革命主義？這問題是從幾方面的觀察肯定下來的。第一，從前面所述五百年來世界歷史的趨勢看，現在是一切反革命勢力集中在帝國主義之下的時代，要打破這一個陶冶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帝國主義，這時代正需一個對準一切反革命勢力而予以迎頭痛擊的三民主義為武器。

第二，現在帝國主義全力所注射的是中國，而我們革命力量所注射的，一定是要打破侵略中國的這一個總合的帝國主義。旁的民族起來革命，儘管可以提出破片的單純的理論為目標，而我們中國就含三民主義外，沒有旁的革命理論可以適合於集矢於中國的一切反革命勢力的環境而一齊將它擊破。第三，三民主義是近代幾百年來革命的總結品；一方面帝國主義在那兒發育成長，一方面革命的各種理論和趨勢就發育起來，經過孫中山先生的審思明辨和博學篤行的努力，遂成爲一個完全無缺的革命主義的大系統。帝國主義在五百年前發跡，到十九世紀大告成功；近代革命在三百年前發跡，到今日二十世紀，事實上則在各國的革命都受了阻障，思想上獨在中國經中山先生集了大成，樹立了一個三民主義；有思想上集了大成的三民主義，近代革命潮流，其總匯歸必由是引起，而在事實上一定會衝破歷史的阻障，重新展開，使二十世紀在將來的歷史上爲三民主義革命開展的新世紀，而二十世紀的世界爲三民主義的世界，這是可以大膽預斷的。總括這三點來說，目前這一個時期，是三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開始決鬥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那一個壁壘方面，一切反革命勢力，正如上面曾經論述過的，都已有連環的結合。在三民主義這一個壁壘裏面，各國革命潛勢力，必將爲實際的需要所迫，

逐漸依皈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大家都在同一的三民主義之下連環地結合起來。但是在各國革命的潛勢力連環結合之前，各國革命者必須了解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而且遲早也自然要被動的來研究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這也是可以預先斷定的。因為各國革命勢力在錯綜的和帝國主義交鋒之際，遲早必定要發見各種反革命勢力錯綜的連環關係，而共同感覺應用我們具有連環性的三民主義之必要。所以我們為革命前途一般的發展，澈底認識三民主義的連環性是當前革命者的最大責任。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是和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連環性針鋒相對，大體上既已肯定，於是我們就要分析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的基點是如何。

第一個部分的基點：三民主義是從民族出發的，不是從個人出發的。換言之，三民主義的革命，在於打進帝國主義的營壘，將它個人主義這一個核心革去，另換一個以民族福利為出發點的核心，從新建造革命的文化起來。我們開始已經分析過帝國主義系統底下的反革命勢力，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人類自衛的武方，本來不壞，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就壞了，而其極端便變成掠人的軍國主義。物質的享用，凡人都是需要的，但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則

生產分配都變成了吃人的資本主義。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便不能沒有政治生活，但是個人主義發達，便把人的公共管理權轉移到少數人的手上，結果不是個人獨裁，便是階級專制，從君主到資本階級專制。從資本階級專制到無產階級專制，簡直看遍了的官僚政治，總不離個人主義在骨子裏作祟。這個人主義，簡直是西方幾千年文化的老根，要西方拔掉它的老根，另換新種子，不是容易辦得到的；只有東方，自從它的文化發生以來，都是壓制個人主義，偏重社會道德，纔有培植文化新種子的資格。東方近幾十年稱讚西方，要是稱讚它的物質文明，還有可說，若論它的文化基礎，則它那種鐵骨森然的個人主義，實我們東方素所鄙棄的。孫中山先生說，西方行霸道，東方行王道，霸道本於武力，王道本於自然；這已指明東西文化之大較。西方的武力，完全建築在個人主義上面，所以國家是強有力的個人造成的，而一個國家裏面併吞了若干弱小民族，尤其表明個人主義超越於自然力所結合的民族之上。至於東方，個人主義完全被自然力所柔化，便不能如西方個人主義那樣露骨。譬如中國人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這已比個人主義進了一大步；可惜限於物資文明的不發達，這種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未曾擴張成爲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然而中山先生就說，我們中國要恢復民族精神，比西方要容易

得多；因為西方是以個人爲單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則個人和國家中間便是空的，而我們中國是宗族爲單位，個人和宗族之間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爲單位再聯成國族，便很自然，很容易。由此可知東西文化的基礎，迥然兩途：西方以個人爲單位，所以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制度都是掠奪的工具；我們要以東方固有的天然團體爲單位，擴張起來便要以民族爲單位，一切制度都要從此點出發，纔不會落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那條路上去。我們以三民主義來打倒帝國主義，根本上就是站在民族的單位上打破個人的單位。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的基點，就在起首即以民族爲單位。民族主義，固然不必說是以民族爲單位的，就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也是要以民族爲單位的。如果不以民族爲單位，而以個人爲單位，則民族主義便變成國家主義，民權主義便變成階級政治，民生主義便變成資本主義，這是五百年來歷史所予我們的鐵律，絲毫不能逃過的。許多人，不認識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而且不認識這連環性的基點是民族不是個人，所以安心盲目地詆毀三民主義是國家主義階級政治和資本主義，我只稱許這種人滿腦裝着帝國主義的思想，絲毫看不出他們有什麼革命頭腦的。現在這種滿腦裝着帝國主義的思想的人，還天天自命是最革命的，我只好說：「革命革命，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啊！」

第二個部分的基點：三民主義的作用或目的，就是求生存。所以孫中山先生說：因為求生存，人類就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不過求生存的方法，是各個時代不同。一個時代的情形變易，求生存的方法也要變易。譬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洪荒時代，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神權時代，人同天爭，所用的部落酋長的權力；自神權時代到君權時代，都是少數個人的力量。但是我們現在的時代，個人單位必須要打破，民族單位必須代之而興。因為現在個人的生存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民族的生存。所以合攏第一個部分的基點和第二個部分的基點，三民主義的基點是求以民族為單位的生存，而不是求以個人為單位的團體或民族或國家的生存。這一個基點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隨便誤解的。

因為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都會生出壓迫者和被壓迫的兩種壁壘，甚至生出一層壓迫一層的無數壁壘。如果以民族為單位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那便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分別。現在世界上所有壓迫人和被人壓迫的組織和制度，經過幾百年來革命的培植，有的已經消滅，有的還是存在。然而即此就可以曉得世界進化的趨勢，已向消滅壓迫者和被壓迫的方向前進，而這一個進化趨勢的新紀元，必定是以民族生存為出發點，而不復以

個人生存爲出發點。三民主義，就是樹立在以民族爲單位的生存問題的基點上。以民族爲單位，所以才講民族主義，才講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以民族爲單位，所以才講民權主義，中國要四萬萬的人民都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同時世界各民族的人民都要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權；以民族爲單位，所以民生主義，不但要中國民族的生計問題圓滿解決，各民族的生計問題也同時要圓滿解決。革命的文化，一切都要在民族的單位上面。認定民族的單位，則革命必定要掀翻一切以個人爲單位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和制度，要掀翻跨着若干民族而組成的國家，要掀翻掠奪若干民族的生活需要品的經濟制度。不但如此，認定民族爲單位，則革命必定要實行連環的三民主義，而實行連環的三民主義，其要義就在：（一）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二）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三）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

這三個連環的意思，我們可以引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明。先生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是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他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

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又說：「不能有，焉能治；不能治，焉能享。」這已扼要地說明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了。我們要曉得，中山先生是站在以民族生存爲單位的立場，而統籌革命的建設計畫的，所以民有民治民享當中包含了三個連環的意義：第一，從民有的立場看，民有是目的，而民治民享是手段；第二，從民治的立場看，民治是目的，而民有民享是手段；第三，從民享的立場看，民享又是目的，而民有民治是手段；而總合起來，共有共治共享都是以民族生存爲基礎的，共有共治共享，不是以個人爲基礎的，共有共治共享，更不是以階級爲基礎的，共有共治共享。

這三段意思，須得分別地說明。何以說民族主義是目的，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手段呢？一個民族的力量，靠着兩個條件而發生的：一個是政治的力量；一個是經濟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要怎樣纔是效能大的呢？從前君主專制的力量，比起階級專制的力量，當然小得多，所以世界上有兩種趨勢：一種趨勢，把政治權力集中在資產階級手裏；一種趨勢，把政治權力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兩種趨勢的擁護者，以爲兩種階級政治的力量都比君主政治強得多。

但是 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權主義，政府有能，而人民有權，權能分工，就是充實民權的最經

濟的手段，而使民權成爲民族的民權。這種民族的民權，力量就要一切君主政治階級政治的力量大得多了。換言之，民權必須充實全民族，民權的力量才大；民權的力量大了，就是民族的力量大了。所以民權主義，在充實民族的力量上，是一個必要的手段。可是民族的力量，同時還要靠經濟的力量發展。要增加經濟的力量，必須要全族人的衣食住行各項需要滿足，沒有大富和大貧的區別，只有人人各依其聰明才力之不同而爲社會分工的區別；人人爲社會分工而服務，則這樣的民族，必定是世界經濟效能最大的民族。所以民生主義的效果，能夠充實一個民族的經濟力量，是任何科學家所當公認的。這是從民族主義一方面看，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增加一個民族的力量最大工具。

但是從民權主義一方面看，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又成爲發展民權主義的必要工具了。

爲什麼呢？第一層，民族思想不發達，民權思想也一定不發達。人要曉得自己民族的生存要緊，才曉得自己個人對民族有什麼責任。如果沒有對民族的責任心，便沒有要求民權的必要性。權是因責任而生的；沒有責任，權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我們革命者主張人民要有權，不是要人民有權去謀個人的私利，乃是要人民有權擔當對人類的責任，而起點就要擔當對

民族的責任。如果民權是爲個人謀私利而設，則民權也老早要和君權遭人們的深惡痛絕了。所以要求民權，始意就在把對自己民族的大責任放在人民個人的肩上。認識這個對民族的大責任，便是民族主義精神。爲求能夠擔得起對民族的大責任，所以就er不能不要民權。所以民族主義，實在是民權主義的責任之對象；要民族精神濃厚，民權精神才隨之而濃厚。這是理論上的關係如此。在事實上，則近代歷史中，民權運動，往往伴民族衝突而起。每一個民族脫離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而獨立，成功則民主政治是它的新國家組織的根據，不管它的民生主義在事實上的成績如何，失敗則民主思想的潛勢力越一天一天的澎漲，也不管它的民主思想的實際如何。至於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是要中國民族精神恢復到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一切壓迫，然後才能負得起實現民權的思想；而同時也要中國人民實行民權主義，才能完全表現出中國民族的能力；這兩方面的密切關係，是互爲因果，不能分離的。第二層，民權主義，要靠民生主義實現，才能有實際，這也是很顯明的。所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固然我們講民權不是講禮義，但是這句話所含的道理，如果改換字面來說，「衣食住行足而後民權興，」就不錯了。以中國民族現在窮乏的情形而論，假使沒有軍閥，沒有內亂，民權也還是不能充分發達。

爲什麼呢？因爲四萬萬人大多數是大窮，少數比較好的，也是小窮，大家都窮，還有能力來行使民權麼？不能的。所以要民生主義實行，把中國辦到家給人足，民權主義纔能普遍地充實地發達。再就歐美民權的現象說，它們是實行了一點代議政治，人民不過享了一點選舉權，比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可謂差得遠了。然而歐美這一點民權，還是不能普及，最大的原因就是有錢的人纔能行使選舉權，而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心思去行使選舉權，就要把應有的一份民權放棄。可見要衣食住行足，才能希望民權充分地發展，否則就是理論是理論，實際是實際。民生主義所以要與民權主義同時實行，個中道理，正是因爲要靠民生主義的實行，來把民權主義的理論和實際打成一片。像歐美各國那種民權發達史，它們的民權是跟着經濟發達而來的。它們的資本生產制發達，民權只是資本階級的民權；在資本生產充分發達以前，民權使只是中產階級的民權；在中產階級未發達以前，民權便只是貴族僧侶騎士的民權。它們的經濟發達史，是沿着一條邊走的，所以跟着經濟發達而來的民權史，便也一條邊的民權，而不是普及全民的民權。這一種歷史的意義，是很足予我們以深刻的教訓，這就是：民權是隨着民生發展的力量而發展的，民生制度是階級的制度，民權便一定成了階級的民權，民生制度是全民的制度，民權便

一定會成全民的民權。中山先生的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的民族，其中個個要衣食住行滿足，個個要行使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這四個直接民權，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要同時並行。總合前後兩層意思，就是我們從民權主義的立場說，民族主義有提高民權主義所含的責任心的作用，民生主義有充實民權主義所含的可能性的作用；三民主義的連環作用，這是很顯明的了。

再從民生主義一方面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又成了發展民生主義的必要手段。在今日世界經濟生活複雜的時代，要計畫一個民族的生計政策，發展一個民族的天然富源，扶植一個民族的農工商業而管理保障之，並非可以同其他民族斷絕關係就能夠做到的。就世界的範圍說，帝國主義的鐵爪伸入五大洲，海陸空交通線突破了一切人爲的和天然的藩籬，資本流通尤其是無孔不入，而生產品消暢的市場，簡直是星羅棋布的遍於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能夠鎖閉國門來講民生主義？就中國自己說，我們沿海腹地的險要門戶，被帝國主義者洞開了；我們的礦產鐵道，被帝國主義者抓住了；我們的海關被帝國主義者扼着了；另外還有許多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束縛起來，要我們單純地講民生主義，怎麼行呢？由前之說，中國是不能在國際

上孤立而可以行民生主義的；由後之說，中國是不能在國境以內單純地行民生主義的。合而言之，中國非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同時並行不可。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裏，已經說我們中國民族所受的禍害，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的壓迫。這三種壓迫，其所以壓迫的是政治問題範圍內事，和經濟問題範圍內事，而受壓迫的，却同時又是民族問題範圍內事。我們要解除這些壓迫，要靠民族主義來抵制外力，要靠民權主義來組織內部，然後纔能靠民生主義來發展自己經濟的力量。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從這樣看法，彷彿是三條戰壘；民族主義所以固外防，民權主義所以固堂奧，民生主義所以固後方。撤了一壘，其他二壘都受牽動。我們要民生主義中的實業計畫實行出來，先就要撤消扼着中國交通要塞的租借地，廢除各種不平等條約；這是民族主義的事；次要實施縣自治計畫，使人民皆受四權使用的訓練，這是民權主義的事；這兩種事業辦到相當的程度，然後土地的歲收，地價的增益，公地的生產，山林川澤的利益，纔能有成績，這就歸到了民生主義的範圍。就這種種關係看來，民生主義，一定要三民主義者來實行；因為我們是不能拋却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而能夠希望民生主義的成功的。拋却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甚至假定它能夠成

功，也是外國人來替中國發展經濟的力量，這就叫做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拋却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又假定它能夠實行，也是君主，貴族，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一類少數人來掠奪國家的經濟利益，這就叫做受特殊階級的掠奪。所以民生主義，換任何一種不要民族主義或不要民權主義的人來講，他不是要變成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便是要變成特殊階級的家奴，二者必居其一。

總括地說，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其特點是：民族主義需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來充實它的力量，成爲一種對世界擔負責任的民族；民權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牽繫它的責任心，同時需要民生主義來推進它的實在性；民生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衝破它的前途的障礙，同時亦需要民權主義來保障它的敏活的實施。綜括三民主義連環相通的關係，我可以引述劉蘆隱先生前幾年的話來說：「三民主義，彷彿是一個三稜角的水晶體，一面是民族主義，一面是民權主義，一面是民生主義，而三面都是同一個基礎，這一個基礎就是救國主義。」他又說：「我們更要曉得三稜角的水晶體，是面面通明的，由任何一面都可以看透到其他二面；尤其要曉得，由任何一面看時或由三面一齊看時，都不可忽略三面同體的底邊是一個亮晶晶的救國主義。」這兩

段話很簡明的說出三民主義所具的三面一體和三面相通的連環性。但是我要替他補充的就是這三稜角水晶體的頂點，是貫着世界進化的定律，而其底邊，小而言之，是救國主義，大而言之，實是大同主義。由頂點直貫到底的中心，是生存的要求；沿着生存的要求這一個中心的，便是人的努力，而其努力的階級，起點是博愛，過程是救國，終點是世界大同。我們要曉得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其總作用正是引導人們沿着進化定律而努力，由博愛起，經過國家的階段，而終底於世界大同。這一個根本論點，我們就在下文來說明，同時亦可以把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闡明其較精深的含義和內容。

五、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

孫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民族絕不能爲他種族所壓制；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這話是孫先生用世界的立場來說明他的三民主義的最高概念的。換言之，孫先生這話，便不僅僅是以中國一個民族爲實行三民主義的對象，而且是以全世界各民族爲實行三民主義的對象。我們引申孫先生的思想的含義，就是由一個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到世界各民

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由世界各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到世界人類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世界人類共有，這就是世界主義的極則；世界人類共治，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極則；世界人類共享，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極則。何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能夠做到這種境界呢？我們的答案是：因爲：（一）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二）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三）共產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三個答案也須分別的闡明，而本節且先從第一答案着手。

世界主義，在古代即爲人類所有的理想。就古代的理想所經過的史跡，大概可分下列幾個時期。第一爲宗教的世界主義，古代波斯印度希臘埃及的宗教，都含有世界主義的理想。第二爲哲學的世界主義，自希臘斯多噶派 *Stoics* 和柏拉圖 *Plato* 到中世紀湯麥士 *Thomas of Aquinas* 和但底 *Dante* 一輩，都是代表哲學的世界主義。他們一方面帶着宗教的采色，而一方面又受着政治制度的影響，所以他們的世界主義仍是空想，無足稱述。第三爲近代的世界主義，其間派別就不遑枚舉，概括地可分爲法學派，經濟學派，唯心派，和唯實派。法學派的世

界主義，實在不是世界主義，因為他們目的只在於研究國際間平時和戰時的交際成規，而與世界將來的政治組織，關係非常微小，所以我們可以完全把它撇開。經濟學派着眼在近代世界經濟的實在現象。近代世界經濟現象，頭一件可注意的是輸運的發達。現在輸運的工具，鐵道，公路，輪船，飛機等，把從前人跡不到之區，都開發起來了，而旅行和貿易的速度，比一百五十年前快過十倍，結果就是：生產品不限於銷售一個區域，而可以銷售全世界；資本不限於流通一國，而可以流通到任何有利可以吸收的國家；勞工也變成非常流動的，可以到任何國境尋工作；財政商業，都不是地方的，而是世界的。其次可注意的是交通的進步。從前幾個月纔能交通的地方，現在有電報，郵政，電話，無線電等，只要幾個鐘頭就可達。因此，一個地方政治的消息，財政的變化，智識上的新思想，和科學上的新發明，瞬息可以傳遍全世界。這些事實的結果，便引起經濟學派的世界主義：貿易是世界的，買和賣是以贏利為基礎，不以國家主義為基礎；金錢是不管國界的，甚至可以說是不愛國的，因為金錢之眼，只看着厚利走，不看着國界走；智識是人創造的，不是國家創造的，甚至你說它是國家創造的，但它却不是國家享用的；科學是自然現象的定律，但自然現象又非國家所得而私，乃到處一樣地供人們考察的。這一派的最終結論，總是

根本上希望生產最發達的若干國家或民族，結合起來成一個世界的聯邦，從而統治了全世界。這一種世界主義，實質上不啻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其短處也就用不着過細的批評。要是以學理的眼光批評它，那就兩句話就夠了，這就是：此派只看見現代經濟的複雜現象普遍於全世界，却不了解這種普遍於世界的經濟複雜現象是世界帝國主義而不是世界主義。它的根本錯誤，在於只看到世界的表面彷彿一切都準備好了給世界主義登臺，却不看見世界的裏面是個人資本主義搭起來的臺柱！

唯心派的世界主義者，又稱爲演繹派的世界主義者。這一派的學者和實行家很多，我們不必細舉，其根本的出發點，總認定世界人類無國界無種界無戰爭爲一種無上目的，而在這一個大前提上面，各從其所能的方面，努力以企其理想的實現。遠的不必說，近世如盧梭，孟德斯鳩，邊沁，康德，都發表過對於世界主義的意見。盧梭的根本意思，以爲國家組織是不得已的事，並非合理的事，最好是能夠不要人爲的社會，而返於自然的世界。因爲人和人是天生相愛愛的，只因有了人爲的制度習慣，人同人就不能相處了。但是他對於國際公共法庭的制度，又認爲是各民族平等結合不可少的基礎。孟德斯鳩主張世界的聯邦，而以君主統御之；然而這都

不能供我們以世界主義的真實光明。邊沁比較具體一點，他主張廢除帝國主義，實行自由貿易，要各民族組織世界會議，限制兵備，頒布國際法等；然而他這種論調，究竟是跟於當時情形的說法，沒有多大價值。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文裏，贊同世界聯邦組織，減少兵備，而並不否認國家的存在。他以為世界上每一國家必須建立民主的政府；人類共守的法律，必須由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共立一聯合機關做後盾；各自由民主國的人民，要有世界民的資格，人人可以由往來於全世界，但不得在外國享受土地所有權。康德這一個思想，他以為是直接可以防制帝國主義之勃興的。他以為人的天性，既能愛，亦能恨；所以人在社會中，一方有社會性，同時亦有反社會性；這兩個傾向互相摩蕩，便可致人類於大同之境，而他所懷想的世界組織，便是適合於人類的矛盾性，因矛盾性的互相磨勵，使他們朝大同的方向進展。但是這些唯心派對於世界主義的概念，大體上都可以說並無系統的理想，所以值不得什麼批評。可是近代國際間政治的經濟的衝突愈多，世界主義的思想愈加激增，除了宗教家政治家科學家勞動家資本家都各有其懷想的世界主義而表現於種種國際團體和活動外，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唯實派或歸納派的世界主義者。

唯實派的世界主義者指摘國家主義的弊害，不遺餘力。他們分析國家主義者所有的原則和辯辭，都是含糊的，籠統的，而且往往和實際不相干的。所謂『國家的尊嚴』、『國家的光榮的傳統』、『維持列強的均勢』、『人性不移』、『強者生存』、『在太陽中爭地位』、『戰爭是一切的基本』、『白種人的責任』、『黃禍』、『黑禍』一類的思想，都是感情作用的濫調。人們對於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只是當作真理去接受，絲毫不肯懷疑。國家最高主權論及其演繹出來的理論，結果只能導人類於戰爭，所以非嚴格地限制它不可。限制國家的根本理由是：國家阻礙人羣的進步；人類應該有其共同利益所藉以保障的國際法，而少數國家就搶奪國際法的假面具，作壓迫人類殘害人類的行爲；國家唯一的基礎是武力，然武力是不可靠的，所以國家也是不穩固的，因為武力最強的，終敵不過二個以上較弱的國家聯合起來的武力，假使武力可以奠國家永遠的基礎，斯巴達何以滅亡，羅馬何以滅亡，拿破崙何以滅亡，最近威廉二世何以倒塌？國家主義現在與人類生活的實際不相適合：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人已經是世界的公民；只有政治生活還是國家性的，其原因就是由於國家是藉法律的概念來護持的，法律概念落後，而人類實際生活向前，所以國家還是包辦了人羣的政治生活，把人羣阻止着而不

得前進。國家主義者以爲人性是不可改變的；戰爭是人類的天性，所以須得軍國主義來發展勇的本能和自衛的本能。世界主義者就說：人性是可以改變的，否則古代原人的野蠻，何以今人不同他一樣？如果勇是人的本能，自衛是本能，黷武主義何必怕它在和平世界衰歇下去，難道你又承認人性是可改的麼？國家主義者以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到人都變成安琪兒的時代；但是人性既不能改，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主義者說：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服了毒藥；但是服毒藥是可避免的。同樣地，戰爭不是人性的結果，是國家的制度存在而強迫人性向那一方面去工作的結果，換言之，是朝着相互仇視的國家制度，而這種國家制度是暫時強定的，是過渡的，不是永久適當的，更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國家鬥爭的觀念，爲民族互助的觀念所替代，戰爭便不需要，和平便是需要，只是一轉移間的事，而人性絲毫不必有什麼變動。美洲十三州的殖民地，本來是互相突衝的，但是合衆國造起來之後，和平就在新的環境當中實現出來，而並沒有經過人性改造的必要。許多不同血統不同言語不同宗教的民族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強定國家的疆域，叫它斷絕交通是不可能的；商業和財政純是世界性的；對外投資，得利的是少數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同國的一般人民，然而在國家制度底下，一般人民却被迫得要

做投資者的後盾，甚至替他犧牲；這就足以使一般人懷疑國家主義的實在價值。像此類的理論，歸納派的世界主義者是滔滔不竭的，我們也引述不盡。他們比以前各派世界主義者都優長的地方，在於不是呆笨的認定世界主義為一種最高目的，但只認定它是自然的，合理的，而且是人類其他種種目的和活動的，必然結果。他們的理論，多批評，少建設；長處在前者，短處在後者。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只見到世界主義的可能，而不能計畫其必能。除了此一派而外，還有無政府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世界主義者，讓我們留待後面來批評。

我們總核以上各派的世界主義者，曉得他們有幾個共同點：第一，掙擊戰爭；第二，反抗現在的國家組織；第三，除正統的經濟學派的世界主義外，大多數抨擊資本制度。而這三點，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我們前面所分析各種含義的帝國主義。這是世界主義者對現在的批評。在理想的未來建設方面，他們抽象的概念，也有幾點可以肯定的：第一個總概念是希望無種界無國界無戰爭無階級衝突的世界之實現，第二個概念是各部分的民族都有民主自治的組織，第三個概念是各民族的民主自治之上，一種世界的政治總組織終於非有不可，無論這種組織的方式如何。我們把這種積極的概念和消極的批評總括起來說，世界主義的理想是和三民

主義的理想相同的；所不同的，就是世界主義只有理想，而其實行的方法，可謂毫無系統，若三民主義，則由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時並行的民族主義，就是實現世界主義的有系統有計畫的方法。中山先生說：『我們受屈的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因為『世界主義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那便是根本推翻。』這段話，就把實行世界主義的方法扼要說明出來了。因為世界主義如果不從民族主義做去，則世界主義終歸是理想，而不能實行；要實行，就要了解世界主義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根源，而從根源上着手去實行，才能達到世界主義的理想。所謂從實行民族主義着手，就是要把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要把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便須內部人民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才是自由，才能同其他民族平等。如果不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這種民族便是受屈的民族，所以孫先生才說：『受屈的民族，』『是不配講世界主義的。』換言之，要做到了個個民族不是受屈的民族，世界主義才能真實地實現。所謂個個民族不受屈辱，即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亦即實行人民有四權而政府

有五權的民權主義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亦即實行滿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的民生主義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這樣做到全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方法，就是實現世界主義的方法。

六、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中山先生說：「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又說：「民權主義，就是政治為人民所共管。」把先生的意思扼要地說，就是要一個民族以內人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推而至於全世界以內人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所以民權主義的起點，是以民族為對象，而其最後目的，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無政府主義，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的無治主義，所以它的目的，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相同的。

無政府主義中，有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兩派：英國維廉哥德溫 William Godwin，法國蒲魯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美國波士頓無政府主義者和德國喜密次 Caskar Schmidt 等屬於前者；巴枯寧 Michel Bakunin 和克魯泡金 Krokotkin 屬於後者。我們且先將兩派的思想引述一下。

哥德溫以為我們個人的無上上道是全體的幸福。以什麼為全體的幸福的标准呢？

由幸福的本質而定，即由心的本質而定。」因此，「幸福是不變的，與人類尙爲人類的期間，同其繼續性。」他以爲人類除了極少數人，因天授的弱點和愚昧，不能作理性的生活外，最大多數人都能自處其最善的幸福生活。所以他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是聰明到能夠自治的，而不需任何強制的約束和干涉；因爲政府，甚至是最優良的，也是一種壞東西，所以我們就應該極力減少對於它的需要，直到維持社會和平的可能限度爲止。」在我們個人一方面，「義務是行爲的方式，而爲全體的利益，規定個人能力之最善的適用。」在社會一方面，哥德溫否認法律，否認國家；但在現有社會裏，因爲少數的愚昧和弱點還存在，以小社會組織之連合，防制罪犯，並抵禦外侮，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機關，到了以理服人而不以力制人的時候，也可以消滅。

哥德溫的出發點是個人的幸福，和邊沁的思想的出發點，同帶英國政治理想的采色，這是很顯明的。蒲魯東則和盧梭有相同的一點，以爲人是天然平等的，人的權利就寓於天然的平等之中。但是他認定每人的權利，只有各人自享其勞力的結果，平等的實際就在此，舍此而外人就沒有其他所謂權利的，這就與盧梭分道而馳了。他由這一個根本思想所生的推論，就是工銀勞動者甚至在已得工資之後，對於生產品，是還有一種自然的財產權存在的。所以地主

和資本家於生產品是沒有份的，有了份便是掠奪，因此，他所下的定義，就是「財產即劫掠。」他把人的一切活動納在產業當中，所以無政府制度，是將政治的職務吸收於產業的職務之中，社會的秩序，順着單純職務之實施，而自然保持。到了這時期，各人可以說：「我是我的主權者。」

——他闡發哥德溫的理論，而分析的力量和辯論的才具，爲哥德溫之所不及。人是天然的有社會性的，這和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意思相同。社會性於何表現呢？於三種程度表現的：第一，人與人的同情心；第二，人與人之間人格平等的互相承認；第三，人同人之間的待遇性，起於各人聰明才力之不同，而其表現，則聰明才力較優者能以慈悲待人，而以犧牲待己，聰明才力較小者能以恩誼敬意相報。三種不同程度的社會性，於合理的社會生活是極需要的。但各人的人格平等，被財產制度所毀，而政府的基礎，即建築在財產制度之上。所以蒲魯東反對財產制，尤反對政府制度，最反對的是君主專制主義。他分別無政府主義與民主的政治和共產的政治，他說：「共產主義，是以總體統治總體；民主主義，是以各人統治總體；無政府主義，是各人統治各人。」依他的批評，自從財產制度發生，人就不能不向平等裏面找尋人格；自從政府制度發生，社會就不能不向無政府主義裏面找尋秩序。因此，他就憤激地說：「安那其——就是各人頭

上不戴什麼主人，不戴什麼統治者——這是我們一天快似一天要眼見實的政府的體制，只是人們頭上慣於奉戴一箇人做了主人，把他一人的意志奉爲法律，便反而把安那其當作騷亂的代名，登壇造極的混沌。」不是的，無政府是唯一真正的自治政體。在無政府的社會裏面，人只要循着科學的實在真理爲社會生活的指南針，而並不須遵從任何統治者的意志。人民處置其公共問題，應該像社員處理其社務，而一切都取決於科學和統計。所謂政府，不過產業管理的選員。所以產業的管理權，應該在共同勞動於其產業全員的手中。無政府主義之特殊目的，可以說是以人民直接政治，替代了專制政治和代議政治。這樣的組織，其共同生活，自然非分立爲小團體不可。但是從其小團體的意思，而爲團體間的同盟，也是自然的結果。所以蒲魯東的結論是：唯一公道而真實的社會組織，是自由集合，自由——其唯一目的在保持生產的工具平等和交易的價值均等。政治是研究自由的科學。最完善的社會，是秩序和無政府並存的社會。」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理想，蒲魯東尙非極端派的代表。代表極端個人主義的要算德國喜密次。他著有「唯一者與其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發表他的極端個人

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他說：「人類不帶有什麼使命，沒有固定的事業和職業，恰如動植物不帶有什麼神命一樣。人類沒有使命，但只有力。力是於其所存在，表現自己。」蒲魯東的個人主義，尙容許真理，權利，自由，人道等等存在，喜密次的個人主義就連一切都排除了。只看他更進一步的說：「沒有存立於我的面前使我服從的真理，以及權利，自由，人道。」「若果因人類是人，有非捧獻其生命與力的一個真理存在，那麼，人類便是服從一種規則，支配，法律的奴役。」因爲「你如果信真理，你便是不相信自己，你是一種奴隸，奉教者。祇有你是真理，你還在真理以上，真理在你之前受裁判的。」他以爲人類是祇爲自己的幸福而建設社會的生活，對於各人無上至道，是各自的幸福。他說：「我愛人，不止愛個人，而且愛各人。但是我愛他們，是以利己主義 *Egoism* 的意識去愛。我愛他們，是於我成爲幸福的緣故。」他的主張走到這樣極端，真可以說得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不但如此，他差不多要併中國的楊朱莊周爲一談！

但是他究竟還要肯定社會的生活，不問他的出發點如何。拿他比較巴枯寧等的共產無政府主義，則他是標揭利己主義的意識的，而巴枯寧和克魯泡金，於肯定社會生活外，還進一步

主張自由互助的社會。在這一箇基點上，巴枯寧等不但自別於喜密次，而且自別於一般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八六八年巴枯寧在瑞士創立「國際社會民主同盟」其黨綱大略是：（一）我同盟宣言自己是無神論者，希望廢止一切宗教，希望信仰由科學而消滅，神之正義由人之正義而消滅；（二）希望廢止政略的，宗教的，法律的，以及資產階級的一切制度之結婚；（三）我同盟在萬般事物上，澈頭澈尾廢止階級，同時各個人無論男女皆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平等；（四）要求禁止遺產相續制，而將來各人對於其勞動之結果，同等享有各個人的利益；（五）要求土地，勞動所用的機械，其他一切的資本，都成為全社會的共有，只是勞動者，即耕作的和製作的團體，始得使用之。巴枯寧對於具體的主張，除此而外，幾不多見；其原因就是他的實際活動，多於文字的宣傳，而且實際活動的結果，牢獄生活多於自由的生活。幸而他的思想，給他著名的門徒克魯泡金闡發得較詳盡。他們倆的心理理想是自由互助的社會，而克魯泡金尤其努力提倡互助。巴枯寧認定團體不應靠社會或政治的強制，而要自由任意的集合，克魯泡金就本着這一個理想，而設想從互助的實行上求其實現的方法。在他所著「農場，工廠，和製作所」及「麵包之掠奪」，克魯泡金努力證明的，就是如何可以使各人做最快樂的工作。

而全體獲得最適意的生活需要品。他說：「革命不只是政治組織的破壞，而是包含人類知識之覺醒，發明的精神之激進的；要放射新科學的新曙光；與其說制度的革命，毋寧說人心的革命。」

「所以他認為如果生產能夠更科學一點，更組織好一點，各人只須做時間比較短的適意勞動，就足夠全社會的人口得着安適的自給生活。如果文化和進步要與平等共存，那麼，平等就不應該包容各人每日為區區一點生活需要品而作長時間的苦工。人類沒有閑空從科學和美術中求進步，則科學和美術都要絕滅，而一切進步都不可能。所以克魯泡金以為只要人的生產力的量和質，得着科學的新方法幫助，必能大大的增加；只要各人的生產力的量和質增加，則無政府主義便不致視為烏託邦了。對於工銀制，克魯泡金主張根本廢除，而其理由就和許多共產主義者有別。因為他們以為各人的勞動，應該基於團體實際的需要，而得報酬，纔是合理。克魯泡金就更進一步說：無政府的社會，是沒有勞動之必要和責任的，而全社會各人都平均享有一般事物。沒有作工的責任，沒有報酬，但是工作却人人願做。因為克魯泡金所見的無政府的社會當中，實際上人人都寧肯勞動而不肯曠閑的，為的是那時候的勞動，既非過分的，又非奴役的，且亦非如工業主義所產生的過分專門化的職業之限於一種特殊的工作，但各

人不過每日作幾小時勞動的活動，舒展舒展各人的自然創造衝動罷了。這種勞動，是快適的，各人幾乎不覺着是勞動。沒有絲毫的強制性，沒有法律，沒有政府使用任何強制力。一切社會的行動，皆基於人人普遍的同志，而非基於多數人的強迫，不連最小數受強迫的人也沒有。由此種見地，克魯泡金不贊同馬克思派的權力集中主義和集產主義，是無足怪的。但是他比馬克思派物質幸福主義，還進一步為經濟的平等，他說：『我和勞動者及其同情者親密交際之時，便看見他們尊重其個人利益，不如尊重其人格的自由之更真切。去今十五年前，他們為交換其物質的利益，想賣自己的人格自由於統治者——不問統治者是什麼，便是帝王，也是想賣的。』——現在可沒有這樣事了。『人格自由』是馬克思派著述中不容易遇見的，有時還要拚命的反對。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幾於水火不相容，這是許多人都曉得的。他們非難無政府主義，大抵不外兩點：（一）以之為個人主義；（二）以之為是空想。其實除喜密次一派極端個人主義特別揭發利己的意識之外，如巴枯寧，克魯泡金，何嘗否認社會？他們所主張的自由互助的社會，這理想是無論如何看法，不能說它有惡意的。本來從人類之自治的生活方面看，人

是以個人而獨立地存在的；而從協同的方面看，則人不能以個人而獨立生存。從自治獨立的方面說，有個人主義，則其短處在於以破片而夢想全體；從相互協助的方面說，有社會主義，則生出只知有社會不知有個人，和既知有社會亦知有個人的兩條理路。如克魯泡金一派，與其說是『共產的無政府主義』，無寧說它是『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或『無政府的社會主義』。所以拿個人主義一點來抹盡無政府主義，實在過於單簡。

社會主義者如英國的哈因德曼，德國的李布克內西，都以無政府主義為狂暴的個人主義，極端的和它反對，但是列寧一派自命為馬克思的正統派的，却不如是。列寧的『國家和革命』舉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差別，大要有三點。其一，兩者雖同一期待國家和政治權力的廢止，惟馬克思主義主張以社會革命最後的結果而國家死亡，無政府主義則立刻要求其廢止。其二，馬克思主義於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之後，還代以無產階級的機關，無政府主義祇要破壞國家，不言以何者為代。其三，無政府主義否認馬克思派於所謂過渡期間的利用現在國家權力為無產階級準備革命以及革命的獨裁。簡括地說，兩派的爭點，並非理想的差異，而是方法的差異。馬克思主義不欲陷於無政府的空想，所以不贊同其主張。但是兩派方法上

的差異，所引起的劇烈爭辯，完全是主張強權與否的問題。恩格斯稱蒲魯東一派為排權主義者，說他們反對任何一種威權，任何一種秩序，所以他駁詰他們說：「試看工廠，鐵路，輪船，就應該明白，凡是以使用機械及多數人之規律的共同作業為基礎的複雜事務，非有種種權威和勢力，便不能運用適宜。如我舉出這種證據，則排權主義者只能這樣作答：「不錯，這裏不是為的威權，我們給予我們的代表，乃是給予他以一種使命。」這種人以為名義既變，事實也就不同。」

「如果將來社會的組織，僅僅是產業條件不可避的限制以內，許有權威，那麼他們可以諒解。但是他們關於一切必要權威的事實，總沒有看見。他們只對於威權一個名詞，做夢也是反對。」恩格斯挾着階級意識又說：「排權主義的先生們曾見過革命的事嗎？革命，無疑地是最要威權的。革命，是人民的一部，用着鎗砲，即用着最有威權的手段，強制別一部人民意志的行動。得勝的一部，須掌握政權，予反對者以恐怖，剝奪其權利。假使巴黎公社不是靠着武裝的民衆，恐怕立刻維持不住。我們不是還把不能充分使用這種權威，去排難巴黎公社的麼？排權主義者如果不懂這些，就只有陷於混亂；懂了還要辯，那末便反叛了革命的階級；總之，在這兩種情況之下，他們總替反動的利益努力而已。」這就是列寧一派人所認為攻擊無政府主

義最適愜的理論，不是其他社會民主黨所能拿得出的。列寧說：「社會民主黨向來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批難，只是說：『我們真要國家，無政府主義者不然，』這自然使有革命思想的勞動者聞所憎厭。但是我們稍微勘察一下，恩格斯究竟是一面之詞。他說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一種秩序，』已說得過分。就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派的蒲魯東，尙且說過『無政府主義與秩序並存，』何況主張無政府的社會主義的克魯泡金呢？至於將工廠，鐵路，輪船的管理事權，比例一切權威，真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辨證唯物論最歡迎科學家『由量變質』的名理，如上所述恩格斯的權力論，把蒲魯東一派的『使命不是威權』只當作是名義上的變換，直是把質和量一概抹煞，而不必用着分析比較。他說無政府主義者做夢也記得反對威權，難道他自己却是做夢也記得主張威權嗎？

第一國際勞動協會分裂的原因，就是關於將來社會的政治組織問題的意見不合，其問題是革命之後，應該維持絕對的中央政權呢，抑應該廢止呢？在馬克思指導下的中央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以綜合的財產與勞動生產組織而成立的社會主義時代，沒有萬能的中央政權，就到底不能建設維持。權力的主體，任用何種名稱，在所不問，但是必須要有最後處分萬

般事件的權能。以巴枯寧爲領袖的無政府主義者就說：這樣的組織，乃是重演古代專制制度與奴隸制度，而更加以一種極端的形體。巴枯寧派，根本上固是主張團體自由任意的集合的，當然不贊同馬克思派的權力主張。馬克思派又說：這是維持自由競爭，而使之更加劇烈，因而陷此世界於最惡的紛亂中。所以巴枯寧派常詬厲馬克思派爲國家主義者，爲羨權的市僧，而馬克思派則說蒲魯東是小商人，又說無政府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我們且不必管這兩派的互相詬厲，可是因馬克思派的批評無政府主義，我們也就可以拿三民主義和它比較，雖然詳細的討論只能留在後面來說。巴枯寧和克魯泡金根本上着重平等的原則，以爲自由是要從平等上求的，所謂「人不能不向平等裏面找尋人格的自由」這話完全和孫中山先生「如果不得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的思想相同。蒲魯東對於社會性的分析，三民主義也都承認。我們如果把克魯泡金所描繪無政府社會中的人生，認識其個個各願依其創進的衝動和能力而勞動的境界，再看中山先生所說：「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

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了。」那就應該曉得三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平等精義是如何的相通了。這是第一點。無政府主義以爲自由須靠平等去把它解放出來，解放了之後，自由便是有兩面的意義：從個人一面看，就如哥德溫所說，自由便是各人的聰明，至少能夠自治；從社會協助一面看，自治便成了如蒲魯東所說的人民的直接政治，和小團體的自由集合，也便成了如巴枯寧所說，澈頭澈尾沒有階級的差分，沒有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再加以以生產工具如土地資本之爲社會所共有，但爲直接生產者所使用，則此種理想之與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復有何別呢？這是第二點。經濟的組織，無政府主義所要求的是廢除一切壓迫，甚至工作本身的壓迫也要盡力除去，使勞動時不覺着是勞動。爲免除貧富的壓迫，土地和資本是要共有的。在這一點上，無政府主義如巴枯寧和克魯泡金，便與共產主義及三民主義同其理想，而此一理想的根本來由，都是由於看到私有資本的發達，變爲壓迫人的專制威權。這是第三點。由這一點所引出的政治問題，便生出社會主義的正統派和無政府主義的吵鬧。社會主義的正統派以爲如果國家是唯一的資本所有者，則個人便可自由。無政府主義就說這不過是重演古代專制制度，把人類變

做奴役，遂發生我們前面所引述過的爭辯。但是要曉得，歷史的經驗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土地能壓迫人，資本能壓迫人，威權也能壓迫人，以資本歸諸國家所有，則資本和威權併為一體，其壓迫人將尤甚。因此，無政府主義反對正統派社會主義的威權論，實不僅僅是反對現有國家的威權，而且是反對資本和國家併為一體的那種最強大的威權。正唯如此，我們就要公認無政府主義之反對，其理由是十二萬分的充足。但是國家的威權，一味否認它，是否認不了的。要設出方法來，把它節制，把它分開，分開了要把它向適當的地方配置住，使它不為少數人或級階所可得而挾制以壓迫人，纔是最善的辦法。三民主義所以優於無政府主義，就在於不落後到感情作用的空口否認國家權力的論調上去，而從實際上打算權力的分配。權力的分配，就要把政權和治權分開，再把政權分開並治權分開。政權直接在人民手裏，這就是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直接自治。但是如何直接自治，無政府主義者除以自由集合的小團體為理想外，就沒有具體答案。三民主義就有了具體答案：直接民權，是要分為選舉，創制，複決，罷官的四種。這四個民權，如孫中山先生自己所說的，『就是四個放水制，或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直接管理電流；有了四個民權，便可直接管理國家。』

我們更引申說：直接管理了國家，便不怕國家專橫，因為國家的政權分散在人民手裏，國家就不能爲暴，而人民就又能自治。無政府主義的目的，原亦要求廢除國家的權力而同時各人又能自治的；但是於無政府主義就只有這個要求，而於三民主義則有滿足這個要求的方法，豈不是三民主義明明優於無政府主義麼？這是三民主義不同於無政府主義的第一點。無政府主義和各派的社會主義，從來有一個通病，就是往往把國家和政府兩個名詞的意義混爲一談。這不必引述旁的證據，只就無政府主義本身說，它的總目標是不要國家的，但是通常都只當它不要國家又不要政府，其實甚至個人主義的蒲魯東也說『將政治的職務吸收於產業的職務之中』，就明明還不否認政治的職務之存在，何況講自由互助社會的克魯泡金，哪裏還離得掉政府，不過它是另具一種形式罷了。我們既然將國家和政府分別清楚，則無政府主義所要求廢止國家的一個問題，也就容易解決。國家是什麼？如果把政府撇開，它就沒有什麼具體條件。土地是國家麼？人民是國家麼？當然不是，雖然一般政治學者亦往往把它混亂起來。着實說，國家是抽象的，除了政權，它就沒有意義。中山先生把政權和治權分開，便是把國家和政府也分開了。所以依權能分別的原則，國家的政權給予人民管理，政府的治權給予五個有

能的機關替人民作事，那麼，人民就是權的管理者，國家便退處於無權的地位，換言之，國家本身就沒有東西了。這豈不是實現了無政府主義廢止國家的最好方法麼？因為到了國家本身沒有意義的時候，廢止不廢止，簡直是不成問題的事。而這時候，所剩下來的都是有能的而替人民作事的五個政府機關。不但如此，它們亦直可以說是人民自己作事的自治機關。爲什麼呢？因為這五個有能的機關，其職務是人民所分配的，其人員是人民的考試機關所挑選的，其執行事務所經的程序，是要受人民的監督的。簡括地說，它們是人民的公僕，但却不是人民的奴隸，是人民的五觀，但却不是人民的機械。這樣，甚至於在做人民公僕的，也是有其自由的人格，和其他的社會份子，全體都在自由的人格上來爲公共幸福努力，這豈不是連無政府主義對於人格自由的理想也都能實現麼？所以在政治問題一方，無政府主義只有理想，無辦法，三民主義則不但有理想，而且有辦法，這是三民主義不同於無政府主義的第二點。總合以前的三點，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與三民主義同；總合以後的兩點，單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就比無政府主義爲優，因爲民權主義實現大同的方法，是無政府主義之所無。我所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七、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

共產主義，從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到歐文 Robert Owen 和聖西門 Saint-Simon 一派，都是烏託邦的理論，直到馬克思，纔是專從歷史的行程，發見共產的社會之實現，是資本制度自己造成的趨勢所指向的必然結果。馬克思自己的學說，可以總括做三部分，即唯物史觀，資本集中，和階級鬥爭；他自命是用科學方法，持客觀的態度，把歷史的定律，資本制度發展的行程，和其最終趨向共產社會的變遷，一一實寫出來。所以，受物質條件支配的歷史是好是壞，資本制度是好是壞，共產社會是好是壞，馬克思都不下主觀的判斷。他自己很知道，如果下了主觀的判斷，便犯了烏託邦主義者的毛病，而他平日對當代社會主義所下刻毒的譏評，就要變成打還自己的嘴巴了。但他雖不肯自落烏託邦派的恆蹊，却自命要做個預言家。所以他費了一生的精力，用實寫和分析的方法，發表他的全部著作。他的理論，入手就先證明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經濟制度所決定，所謂政治，法律，宗教，文學，哲學，美術，都不過是經濟組織的產物。經濟制度起了變化，纔決定歷史上所有的一切政治變動或社會變動。過去封建的生產制度之崩壞和資本的生產制度之代興，打起中產階級對封建制度的革命。同樣的，現在的資本生產制度孕育了未

來崩敗的條件，等到這些條件成熟，共產制度就也要代之而興。在共產制度未成熟之前的過渡期間，勞動階級必起而對資本階級革命，其方式就是與歷史中同形不同實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到階級專政成了功，由無產階級的勝利就自然會到階級之消滅，由無產階級的國家集產，就自然會到社會共產，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自然會到國家的消滅。這是馬克思的整個思想之總體。這些思想，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年底為德國共產同盟所草的宣言，就已完全公表過。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距共產宣言發表後二十年，他的最重要著作，第一卷資本論，纔現露於世。再經二三十年，第二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和第三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資本論纔先後發表，而第三卷還是恩格斯續成的。我們祇要仔細追尋他的思想生活的行程，就可以說馬克思並不是胸中全然無主觀，不過努力搜求歷史的客觀事實，把主觀鍊成一種『科學的』鐵律，而他乃以預言家的態度，反覆指證社會勢力必然的運命，就自然使勞動階級狂熱地生恨，資產階級也倉皇無主地發抖。馬克思的煽動方法在此，而其煽動所以生出了大力量亦在此。

但是馬克思學說的本身，有歷史的事實作證的部分，不過是限於歐洲一隅的觀察，沒有事

實作證的部分，即關於共產社會實現的部分，還只是預言。預言就不是科學的，而是意度的。所以說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還是不離烏託邦的本質，並沒有科學的實在和具體的方法。

然而從馬克思主義所生出革命運動來說，馬克思的革命力量，全靠他的預言。因為許多人相信他的預言是不錯的，所以大家朝着他所預言的目標而努力奮鬥。於是題問就在：如果他的預言不幸錯誤了呢？根據他種種預言去奮鬥的人們，不就要白費力麼？但是他的預言究竟錯了沒有呢？孫中山先生在民主主義講演裏，就證明了馬克思不但預言錯了，連他所特為以預言的根本思想，即物質是歷史的中心這個思想，也完全錯了。先生說：「人類要求解決生存問題，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馬克思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其實「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足見社會進化是因，階級戰爭是果，而社會進化的因，又是人類求生存的果，人類因為不能生存，其結果便起戰爭，所以馬克思倒果為因，「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因為馬克思倒果為因，所以

他預料世界勞動階級必定要不分國界種界的聯合起來，這種預言，到了歐戰便事實上證明其錯誤。推究他的預言失敗的原因，就是由於他不知道民族主義，是事實上不能被階級鬥爭所打破的。民族主義是縱的力量，階級鬥爭，不過是民族以內的民生問題起了病症的結果，是一部分的橫的力量。馬克思研究歷史，連民族這一種偉大的力量都沒有見到，所以弄到歐戰前後凡相信馬克思預言的社會主義者，便起內訌，陷於分裂。因為馬克思倒果為因，所以他預料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老早應該到消滅的時期，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八十年，資本制度不但還沒有消滅，而且發達到極點的國家也沒有起革命，倒是生產落後的俄國，反而共產革命在政治方面成了功，可見他這預言又錯了。他預料資本集中的方式，是互相併吞，城市資本如此，農村資本也是如此；預料資本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便須減少工人的工資，增加工作的時間，擡高出品的價格；預料資本家先銷滅，商人才能夠消滅；預料工業只要有大量資本有好出產就可以賺錢；這種種預言，都被經濟的事實證明了大失敗。這些預言失敗的原因，孫先生都已經解釋過，我不必重費篇幅來引述。但是先生却有一句重要的話，就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自己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我們說他的革

命力量，全靠他的預言，預言錯了，他就再沒有領導革命的力量。

俄國列寧派自命是祖述馬克思，但是俄國革命是靠依照馬克思的預言成功的呢，抑是違反馬克思的預言成功的呢？依馬克斯的論斷。要資本生產制發達到某種形式中，它的產業

關係變成了生產者的桎梏，而它所孕育的新生產制之物質條件成熟，於是就到了社會革命的時期。俄國的資本制度，不但够不上說發達到馬克思的名理所斷定的那種時期，且亦夠不上和歐美各資本國家現有的地步比擬，難道俄國革命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革命麼？差得遠呵！

而況在事實上，列寧之所以成功，一是由於利用俄國人民反抗君主專制的心理，一是由於在馬克思「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上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而尤其重要的，就是由於協約國派兵壓迫俄國東境，封鎖它的西岸，激起俄國民族的精神緊張，可知列寧的革命，是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事實助其成功，何嘗是社會革命的成功呢？

列寧固自知他的成功和馬克思主義相差太遠，所以取得政權之際，立即施行土地國有禁止私人買賣諸種政策。甚至土地國有，實際上只是實行了克倫斯基政府原有土地農有的口號，任農民分得貴族的土地，尚非列寧新創的政策。然而這也還說得像煞是共產主義的開始，都不

管他。可是俄國畢竟是生產落後的國家，於施行共產主義的經濟的條件和工具，缺乏得太利害，所以不久就改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從共產主義的觀點，是倒退了多少步，但從俄國經濟情形的觀點，是用國家的力量一方面限制私人資本的發展，一方面扶植合作事業的擴大，而同時又是政府直接辦理生產和分配。所以就俄國的生產落後的地位說，新經濟政策可以說是一種俄國的民生主義之初步，因為它用了孫中山先生一點民生主義的意思，而還沒有用到民生主義的方法。所以我們這樣檢查俄國革命的事實，在經濟的立場觀察，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倒是事實上暗合了我們三民主義的革命的一點意思。

但是列寧的革命既然沒有適合於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難道就絲毫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干麼？也不是的。如果因為經濟方面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就斷定列寧一派人的革命完全與馬克思的理論絕了因緣，這却於事實和邏輯都不容許的。本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亦可大別為兩部分，即除了單純經濟的理論外，還有政治的理論。前面敘述他的全部思想概要時，我們已經提及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一點。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以階級鬥爭為基點的，而其講階級鬥爭，也就完全是採取客觀的態度，專從經濟關係上說話。到了無產階級取得政

權之後，馬克思就只說是那時候無產階級自己就是統治者，可是資本階級既已經過革命而歸於銷滅，那麼就是事實上沒有階級的差別，無階級差別，也就無國家了。講到這一點，馬克思就沒有下文。換言之，就是馬克思到了無國家之後，他的意思就和無政府主義相同了。但是馬克思之信徒，却怕無政府主義者譏笑他們的創始祖在最終的目的上投降了無政府主義，於是就設出方法來替馬克思彌補漏洞。德國的考茨基就摘取馬克思的共產宣言上一句「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統治階級的地位，去奪取為德謨克拉西而戰的勝利」的話，而加以解釋，說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目的，在求德謨克拉西。但是列寧就說這樣的解釋，愈解釋就愈糟，因為德謨克拉西的意思是包括全民，這便失却了階級革命的立腳點。所以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裏，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國家的統治權是一個階級拿來壓迫他一個階級的，所以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成了功就不要國家，却是要拿着國家來鎮壓反動。這便和恩格斯所說的同一意義：「革命是人民的一部，用着槍砲，即用着最有威權的手段，強制別一部分人民的意志和行動，得勝利的一部，須掌握政權，予反對者以恐怖，制奪其權利。」據這樣說來，考茨基固然替馬克思不但不會補好漏洞，而且多開了一個漏洞，可是列寧和恩格斯又將馬克思關在無產階級專政

的鐵扉以內，永遠不讓他向共產主義的路徑而去。史丹林下了列寧主義的定義，就更把馬克思主義截成兩斷，留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段，而拋棄共產主義的那一段，截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段，就放在列寧主義裏面做中心，所以纔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嚴格言之，即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與策略。」可見俄國的列寧一派，和馬克思主義的因緣，僅僅乎在於截取了無產階級專制這一點而已。

就以上的分析，歸納下來，便有兩點的結論。就俄國說，列寧的革命成功，和馬克思的預言無關，換言之，它就不是社會革命，而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成了功，馬克思的主義却失敗，這是第一點。就共產主義說，列寧派只截留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拋却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階級專政成了功，共產主義却失敗，這是第二點。因為第二點，所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克魯泡金的遺書就說：「現在蘇俄的革命，儘着殘虐，以其狂暴，殺無數生命。不會設想破壞什麼？向何處行？而只一味破壞。」馬克思和列寧主義者，儘管說：「只反對二十四小時內的拋棄強權，」儘管說：「共產主義社會之最高形態，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然而行在蘇俄的，自始至終，還祇是一個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和策論，把人道，正義，自由，平等，互助，一

切人類社會的機能，拉雜摧毀，而蘇俄革命後的政治，就完全證實了巴枯寧說的，「重演古代專制制度與奴隸制度，而更加以一種極端的形體！」

俄國雖然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的理想截斷，但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又怎樣呢？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本身，曉得它到了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在政治的最高目的上和無政府主義相同，在經濟的最高目的上和一般的共產主義相同。馬克思關於共產的理想，多少言語，歸納下來只說了「廢除私有財產」一句話，而其正面的說法，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實在毫無二致。可是問題就從此生了，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理想，究竟和原人時代的共產制度相同不相同呢？換言之，我們所希望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是退回到原人時代的共產社會去呢，抑是朝着一種新共產社會前進呢？這問題如果不分辨清楚，那麼，共產主義是進化的還是開倒車的，就無從確定，而且共產主義的意義也就永遠只是一種恍惚渺茫的空想。所以這問題不弄清楚，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大障礙。孫中山先生會有一個精確的觀察，依他的觀察：金錢發生，打破了原始共產社會；有金錢才有自由買賣，才生商家；可是機器發明，有機器的人，駕乎商家之上，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便

生出貧富相懸的兩個階級，便生出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必要到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由此可知將來的共產，是由人類競爭一步一步向前進所達到的共產，而非退回到原始時代的共產。到這種新共產社會的時代，人同人爭才可以解決。所以孫先生說：『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甚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盆。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喫，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

共產主義的思想，是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所同具的理想，這已經很顯明了。老實說，這一個理想，並不是馬克思所發明，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和三民主義所發明，乃是人類老早就有了的一個共同理想。但是理想是有了，而方法却未曾有過。所以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裏，就說『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其用意乃在指破共產主義在理想上並不是誰人能夠獨標以自異，要在實行上有適宜的方法，纔能見出革命建設的本領。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在實行上便有兩條總綱，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這兩個方

法，許多人因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有『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依『原則』二字解釋下去，便成了『民生主義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就絕似依照史丹林解釋列寧主義的理路，可以說成『馬克思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豈不令人捧腹？其實『原則』二字，乃指民生主義的實行方法上的『總綱』，簡言之，就是『方法』。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過是實行主義的兩個方法，而不可以總括主義的全體，更不可以代表主義的理論全體。此點既明，則我們歸到本題，就是中山先生看到近代社會問題，都是起於土地和資本，所以先拿出這兩個辦法，一來要打破土地和私有制之發達，一要來打破私有資本制之發達，這直是打中資本主義的要害，使它永遠不能演成吃人的階級鬥爭的形勢。在此一點上，民生主義的方法比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要經過階級鬥爭，實在是有力得多。因為馬克思為歐美已經發生的階級形勢所逼，便取妥協的方法，要順着階級鬥爭的趨向，再來想銷滅階級的辦法，中山先生就預先看出階級鬥爭是必有之趨向，所以就不待階級鬥爭事實之來，就以革命的方法，打斷其來路。所以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如果借用列寧派常用的名詞來說，實在是階級的尾巴主義，因為他這個理論是跟着階級鬥爭的現有事實的腳根來的。民生主義的辦

法，却是跑向階級鬥爭的前面去了。這一點的關係，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辦法不同，隨辦法連帶而起的政治組織的形體也就大異。依馬克思階級鬥爭的辦法，它必須要經過無產階級專制一個階段，才能再說共產。一到階級專制，就不管它是個人獨裁，階級獨裁，或是共產黨獨裁，歸根揭底總是專制的復古主義。這只可以說是開歷史的倒車，距人類所希望的共產主義更倒退了幾百年。跨上了專制復古的虎背，儘管馬克思主義在後面狂喊着「趕快向共產主義之路走呀，」這隻饞虎終於是向赤血河邊和白骨堆裏縱步狂奔的。所以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如果一定要跳上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虎背，便一定要向腥風血雨之鄉而去，永不回到共產的幸福之路而來。

要是不走死路，走生路，則唯一的生路，就是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中的兩條方法，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不過是防止社會生出階級鬥爭的病症，還不是培養社會的生理的方法。所謂培養社會的生理，用什麼方法呢？這也是中山先生已經計劃好了的。先生說：我們單靠預防的方法，是不夠的，還要製造國家的資本。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發展國家實業的門徑有三：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鑛產。這三種實業都發達，每年三種收

入都是很大的。要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所以先生就說：『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一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照這樣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要甚麼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此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八、三民主義的世界

我們依以上的觀察，且來下兩個總結論。第一個總論是：三民主義與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最終目的是相同的，在實現目的之方法是不同的。相同目的是什麼呢？總括地說，就是無國界無種界無階級的一個全人類共有共治共享的世界之實現。對於現在的世界，它們所掙擊的目標亦是相同的。換言之，就是掙擊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這幾種反革命勢力，而尤一致地掙擊帝國主義。它們對於現在的世界之不滿和對於未來世界的理想，既是相同，在情理上就應該是聯合一致，共同向改革現在和創造未來的目的奮鬥的，但是事

實上又何以不然呢？其原因就是由於各種主義的方法不同。方法上的差異，在實行上是一個重要關鍵，其重要實遠過於理想上之差異。譬如十五世紀的時候，歐洲人都是想同東方通商的。意大利所經的路綫是由地中海東岸而達波斯再抵印度。達加馬 Da Gama 的路綫是出了吉不羅爾托海峽向南航行，繞非洲好望角再向東行而抵印度。哥崙布出了吉不羅爾托海峽向西航行，而他相信亦可以直抵印度的。他們往東方，目的相同，但是所經的路綫不同，結果也就大不同。不同的結果是什麼呢？因哥崙布而發現美洲，因達加馬而完成非洲的發現，兩人所發現的都是新世界，而且所引起的世界大變動也特別重大，只有意大利商人只知走舊路，不肯闢新路，於是從此失了海上的地位。這一個例子，就證明天下事許多目的相同而方法不同的，其結果也就大差異。因此一例，也就可以曉得目的之實現，於方法之選擇實有重大關係。許多人在政治上往往主張爲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其結果亦往往遭大失敗，也就是一個道理。就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理來說，前二者是無完備的實行方法，後者如馬克思一派，雖提出階級鬥爭和階級專制的方法，然他這方法就如意大利商人通東方，只曉得走舊路，不曉得闢新徑。看到階級鬥爭是現成的，便以爲這是唯一實現共產理想的方法，而不

曉得階級鬥爭只是社會的病狀，而不是社會的生理，只是搗了資本主義的亂，却不能造出共產的新世界。三民主義的優點，不但在於目的和其他三個主義相同，而在於所指示的新途徑，不僅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並且可以創造新世界，這是兼達加馬哥崙布航海新路之特點而有之，換言之，就是兼三種主義之長而無其短。依三民主義的方法，不但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不但可以消滅軍國主義，不但可以消滅官僚主義，並且可以實現世界共有共治共享的積極目的。這正如達加馬和哥崙布的新航線，不但可以通東方，並且可以發見新大陸。因此，我們就問：三民主義所能在創造的世界是怎樣的呢？這問題的答案，且讓我們下了第二個總結之後，來詳細說明。

第二個總結是：從根本說，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唯民主義。民族主義，依中山先生的簡語，是民有，民權主義是民治，民生主義是民享。但各個的意義，實皆有三層。民有，不只是在民族意義上的民有，而且是在民權和民生的意義上的民有。政治上人民不能自己有權，不得謂之民有。經濟上人民不能自己利用天然的富源，不能自己管理生產分配的條件，也不得謂之民有。民治，不只是在民權意義上的民治，而且是在民族和民生的意義上的民治。換言之，人民

要自治，不僅是要有自治其縣，自治其省，自治其國的權，而且要有能力發展其民族所具有的特點，如語言科學美術文學哲學優種學等，都要能夠自己創造，自己發展，始得謂之民族。同樣地，在民生的意義上，人民要自治，也不只是盲目地要求衣食住行各項需要之滿足，要能夠自己管理生產，自己分配平均，始得謂之民治。至於民生，也不但是人民經濟上的慾望滿足就謂之民生，要同時政治清明民族不受壓迫始得謂之生，要全民族以內個個有擁護民族獨立的能力有發展文化的能力始得謂之生。就人類生存的立場說，求生存就是求生命的充實，不是求生命的空虛；空虛的生命，是不滿足的生命；充實的生命，才是幸福的生命。然而在生命上求充實，要從個個人有自治能力個個人有生活要需滿足個個人有民族獨立性表現這幾方面去求。帝國主義在民族間所具的壓迫性，官僚政治和階級的經濟所具的壓迫性，一方面構成壓迫者罪惡之充滿，一方面引起被壓迫者生命之窮乏，二者都是表現自由正義平等互助的空虛。革命的目的，就在於把自由正義平等互助這種種人生的價值來充實民族的生命和個人的生命，而將一切的壓迫性和被壓迫性根本掃蕩。要負起這種使命，就當找出現有世界罪惡的根源，和人類所具有的力量，再拿人類的力量，去拔除世界罪惡的根源，重新造起一個充滿生命價值的新

世界。但是世界的罪惡的根源是經濟權力之不平和政治權力之不平，所以在民族以內就有貧富差別，有軍閥官僚等少數人包攬多數人的政治權力，在國際就有經濟的政治的帝國主義的攻讐兼併。要打這種種不平而使之歸於平，就要充實大多數人和大多數民族的經濟力和政治力，而其努力的方法就要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齊下手，要從個人和民族兩方面通盤打算。三民主義所以不是其他破片的狹隘的主義所可比擬，三民主義所以是全人類所當共同努力實現，也是爲此。

在實行方面，三民主義所以優異於其他主義何在呢？三民主義所要創造的世界又是怎樣呢？這問題就歸到兩個論點：其一是政治組織，其二是經濟組織。

這兩個基本論點是相連的。但是爲便於明瞭起見，我們可以先從第一論點入手，以見三民主義何以優異於其他的主義。就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目的說，它們都是要做到共有的境界，換言之，就是要實現共產的理想。但是在方法上所發生的關於政治組織的問題，便是共產是要怎樣一種社會來共呢？無政府主義主張要自由結合的小組織之聯合的社會來共有；馬克思派共產主義者主張要階級獨裁的國家來共有；三民主義則主張要民

主的國家來共有。但是三民主義所要的民主國家，不是歐美正統派社會主義者所要的那種民主國家，因為它們是主張代議制的民主，而三民主義則主張直接的民主，所以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可以非難代議制的民主，却不能非難三民主義的民主。無政府主義非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權力過於專制，而以小組織之連合的民主為能實現真正民主的目的，三民主義的國家則沒有階級專制的毛病，而又能實現無政府主義所懷想的真正民主的理想，所以三民主義在此點上面具有無政府主義之所長而無馬克思主義之所短。馬克思主義非難無政府主義不用革命手段去推翻現社會，而主張不妥協的革命，三民主義則在此一點上又備具馬克思主義之所長而無無政府主義之所短。無政府主義非難馬克思主義者只知奪取威權，不惜犧牲民衆的自由互助平等人道以徇之，而馬克思主義則非難無政府主義只知厭惡威權，而不知威權乃所以保障新社會於不墮，三民主義於此則兼具兩者之所長而無兩者之所短。總括言之，馬克思主義着重於破壞現社會的經濟組織，結果則歸宿於絕對的威權論；無政府主義着重於銷滅現社會的政治組織，結果則並維持經濟的自由互助社會的安全之權力而亦無從鞏固；三民主義則兼具二者之長而獨排其短，能使國際和民族兩方政治的和經濟的改造，同等注重，多

方并進。所以三民主義的實行性，爲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不及，正非自誇之談。

但是我們現在更具體一點來討論三民主義對於經濟改造的方法。我們既然知道，經濟改造是要從土地和資本兩方着手的，而其原則便要做到共有的地步。於此我們所要揭破一般人的迷惘的，就是要曉得土地和資本之共有，有的是社會，而對於土地和資本加以工作的還是靠人，其所產生的結果還是給人享受。土地和資本如果徒然給了社會公有，社會不加勞力上去，便是沒有生產。所以共有的問題，實在不僅是土地和資本歸了社會，就算完事，最重要的還有生產力如何組織和生產品如何分配兩個連帶的問題。所以單就共有這一問題，我們也看得出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來，因爲：（一）土地和資本歸公有是共有範圍內事；（二）生產力如何組織是共治範圍內事；（三）生產品如何分配是共享範圍內事。現在且分別來說明這三點。

（一）土地和資本要如何共有 依三民主義的觀察，私有土地和資本之所以能成爲壓迫人的工具，在於土地和資本的權過大。如果把土地和資本的權用方法削平它，那就私有制度的罪惡完全可以銷滅。因此，三民主義對於土地的入手辦法，主張平均地權，對於資本的入

手辦法，主張節制資本。依中國尙無外國那種大地主及大資本家的實際情形打算，則平均地權，須由政府規定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己報價，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如果地主以多報少，政府則照價收買，如果以少報多，政府則照價抽稅，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的改良社會的進步而增加地價，則所增加的利益歸諸地方人民，原主不得歸諸私有。至於節制資本，則歐美各資本國家，已實行徵收累進稅的辦法，而三民主義以爲這種辦法實在不足以銷滅資本制，所以主張把國家的生產事業，分爲國家經營和個人企業兩種：凡小資本小組織的企業，可以任個人經營，但爲防止其資本積漸擴大故，政府當施行直接徵稅的辦法，將小資本企業所獲的利益百分之幾歸諸社會；但是凡各地的天然富源及大規模的工商事業，則歸政府經營，而其所得的利益，完全歸諸社會公有。除此之外，政府的經營，還要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的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的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的各種房屋，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政府對於這種種國家經營和個人經營所獲的利益及所抽的賦稅，除用以經營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外，還須用以發展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及其他種種的公共需要事業。總括起來，我們只須就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種辦法，即可以看出民生主義的根本主義是：（一）將土地權

和資本權分散在個人和國家的手裏，既不是集中在國家手裏促成國家資本主義以壓迫全體人民，也不是集中在少數個人手裏以養成個人資本主義以壓迫多數人民，前者是流於馬克思的國家資本主義，後者是流於歐美個人資本主義，二者都是人類經濟平等的公敵；（二）由節制資本和平等地權入手，到社會共產的境界，要靠政府與人民共同協力，凡土地的歲收，山林川澤的利益，皆歸全社會所有，這樣，則所共的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共現在的產是有限，共將來的產纔是無窮；（三）衣食住行各種需要，要政府便宜供給於全體人民，但是同時還要人民都樂於於社會盡義務，使個個人都能盡其勞力，然後社會纔能不斷的以便宜的需要品供給人人。

（二）生產力要如何組織到共治境界 生產力的組織，要以能使人人樂於盡其勞力為標準；要使人人樂於盡其勞力為標準，便須做到全體人民勞動的時間減少而物質的生產額增加，纔是最善方法。但是問題就在：我們能不能做到這一步呢？以前關於這問題的學理有兩派。其一是馬爾塞斯人口論所代表的，此派以為世界人口依幾何的速率增加，而物質的需要品則只依數學的速率增加，所以此派的結論，就是物質的生產額少，人口的增加額多，其結果便是人口增加額因受物質生產額之制限，而只能增加到物質生產額所能給養的限度。依此派

的結論，人類勞力時間減少而希望物質的生產額增加是不可能的。其二是正統派經濟學者引起了一種普遍的議論，以爲人類如果要使生產額超過於生活的需要額，便須大多數人做長時間的苦工，不令留下什麼時間去休息和娛樂，才能辦到。所以這一派的偏見，也認定減少勞動時間而增加生產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兩派的理論，到現在經科學進步的證明，已經失了效用。而且科學進步的力量，一定能夠使人類工作時間減少而生產需要品反而增加。三民主義就認定科學方法可以使減少勞力和增加生產兩件事同時并進的。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和孫文學說裏面已經舉例不厭其詳，我們不必引述。但是這裏所要指明的，以科學的方法，來增加生產而減少勞力，這是三民主義所要努力追求的。如果這一件事做不到，生產力便無組織，便無銷滅個人資本主義的能力，便無建立經濟平等的社會的希望。究竟這一件事做得到做不到呢？做得到的。何以說做得到呢？以科學目前的進步而論，世界文明國家應用科學而增加生產力的事，實在是很多。譬如英國，以它區區三島所有的原料地方人力，如果全靠科學的生產方法，一年之中所生產的物質品，便不夠給養它現有的人口三個月，不到三個月便要起饑饉。日本也是一個島國，如果不用科學的生產方法，它一年的生產，不夠供養它

的人口到十個月，不到十個月便要起饑饉。德國和日本一樣，如果不靠科學的生產方法，它一年的生產，不夠給養它現在的人口到九個月，不到九個月便要發生饑饉。但是英日德這些國家，現在應用了科學的生產方法，便不愁饑饉。以它們現在生產糧食的增加額而論，它們不但無饑饉，并且很富足。但是這些所謂文明的國家，還是野蠻，因為根據現在的調查，它們應用科學方法的生產事業當中，尚有一半是軍用品的生產，換言之，全世界所謂文明國家，所有的人口，有一半是從事於武器的製造業，而有一半是從事於真正生活需要品的製造業。假使世界完全改造過來，這一半從事於武器生產的人，都用之於生活需要品的生產之途，則科學的生產方法不必再求進步，世界做有用工作的人即可馬上增加一半，全世界文明國做工的人增了一半，便是全世界文民國的工人做工的時間可以減少一半。如此，則從前各國工人每日做工八小時，現在每人每日做工四小時便夠了。這猶不過就可能的方面立說，至於事實的方面，用科學方法增加生產而減少工作時間，是已經很普遍的現象。因為科學方法的主要作用，在於減少人力的作工，而增加天然力的作工。現在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電力來替代人的氣力，是大家都知道的。譬如用火車運送貨物，一個火車頭的力量，可以替代一萬

個挑夫的氣力，一個火車所走的路程，可以替代一萬個工人步行十天的路程，一次火車所消耗的費用，可以比一萬個工人做工減少十倍的費用。其他如耕田織布做房屋的工作，用科學的方法，都有節省人工增加生產到十倍百倍的效果。中山先生說：我們如果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用新方法來發生電力，大約可以發生一萬萬匹馬力。以供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製造大宗的肥料。以一匹馬力等於八個強壯人的氣力計算，有一萬萬匹的馬力，便等於八萬萬人的力。以一匹馬力一日夜工作等於二十四個人的工作計算，那便有二十四萬萬個工人來做工。假如中國四萬萬人，除了老幼不做工，大多數女子不做工，和大多數少年強壯的靠分利不靠生利的人不做工，真正做工的人實在是最少數。中國有最少數人生產，所以中國全個民族都是窮。如果利用天然力來替我們做工，只須利用黃河長江的水力一項，就有二十四萬萬個人的生產力。中國有二十四萬萬個人來生產，則不但可以變貧爲富，並且可以使現有的四萬萬人個個都不必做什麼勞苦的工作，而可以獲得很安適的生活。所以生產力之組織，用科學方法來利用汽力水力火力，可以減少人類工作的量而同時增加生產的量，這是絲毫不足懷疑的事。俱是依照減少人工增加生產這個標準，我們就應該應用科學

方法到農業和工業上面去，纔能達到目的。依中山先生的計劃，我們對於農業，有七個增加生產的辦法。第一是用機器。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作，生產上可以加多一倍，而費用可以減輕幾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的農業，農民每日做工十幾點鐘，才可以養四萬萬人，若用機器生產，則農民只須每日做七八點鐘工作，而其生產力就可以養八萬萬人。第二是用科學方法製造肥料。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和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壞的植物。化學肥料，自來便沒有用過。製造化學肥料的原料，不外硝質磷質炭質三種；這些原料，中國隨在皆有。除此而外，近來還有用電來造成人工硝，像我們中國瀑布河灘的水力是很多的，如果用來製造人工硝以充肥料，農業的生產自然可以大大的增加。第三是換種。這就是一塊土地，今年種這種植物，明年改種別種植物，或同是一種植物，今年種廣東的種子，明年換四川的種子。用這種交換種子的方法，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要增加。第四是除害。農植物之害有稂草，有害蟲。如果用科學方法，稂草可以利用為肥料，害蟲可以銷滅，生產額才能增加。第五是製造。農產品要銷運到遠方，必須經過製造。無論魚肉果蔬餅乾之屬，不是曬乾，便是鹹鹹，要經過這一類乾製方法，才能保存長久，銷售遠處。第六是運

輸。農產品銷售，要靠便宜快捷的運輸方法，而運輸就要靠實用科學，把鐵道、運河和公路開闢起來，使各處的出產能夠以有餘而補不足，而各處的人民始不至憂不足而棄有餘。第七是防災。防水災就要修河道，造森林；防旱災就於造森林之外，兼要築水閘，和利用抽水機。這七種科學的方法，用在農業方面，於國家就可以增加生產，於人民就可以減少工作時間。至若工業方面，我們主張利用科學，以增加生產，而解決民生問題，則有中山先生的全部實業計畫，乃專是爲此而作的。除了輸運、交通、鑛業三部分的基本工業，純然用國家的力量，利用科學的工具和組織來發展而外，還有五種工業，則須由政府與人民協力經營，同時也是要盡量施用科學的生產方法的。這五種工業，第一是糧食工業。在這一部分工業當中，除原料的生產及食物的製造，我們已在農業範圍內說及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製造農業機器，不必靠外國輸入；次要的是茶葉和黃豆二種工業，前者須採用新法以改良其品質，始足恢復中國的茶葉商業，後者須以新法製成肉乳油酪輸入歐美，可使品質極佳而價值低廉。第二是衣服工業。這一部份工業，可分爲絲工業、麻工業、棉工業、毛織工業、皮工業，和製衣機器工業六種。凡蠶絲之改良，棉麻料之織造，羊毛獸革之製作，以及製衣機器工場之設置，都須以最新科學方法爲之。第三是居室

工業。這一部工業的範圍甚廣，由建築材料之製造，以至於燃料，電光，電話，火爐，自來水種種家用品之供給，尤非施用科學新法製造不可。第四是行動工業。所謂行動工業，就是要建造公路，製造各式自動車，如農用車，工用車，商用車，旅行車，輸運車等，以利人民的行動。依中國人口四萬萬計算，每四百人至少需要公路一英里，全國至少需要公路一百萬英里。如果我們能實行縣自治計劃，則每縣以每四百人造一英里的公路，全國一百萬英里的公路必可以最短期內造成。此種公路造成，同時即可設立製造各種自動車的工場，以供給全國人的要求。如果以大規模的計畫來進行此種工業，實於政府與人民而得其利。第五是印刷工業。現在中國對於紙料墨膠印刷機及印刷物，實在需要甚急，但是自己的印刷工業不發達，而一切印刷紙料和機器，皆取給於外國，所以每年損失經濟的利益也是不少。以後要挽回這種利益，當趕緊設立關於印刷業之主要的及輔助的工業，以新方法來經營管理之。以這五項工業，合起我們的農業，都由政府和人民協力來運用科學的生產方法，則我們全個民族的生產力可以增加到十倍百倍，而人工生產的勞苦也可以減少到相等的程度。到了那時，生產之豐裕，簡直什麼都可以共產，像現在各人死板板的為謀生計而勞動的時間可以大大減少，而適應各人的特長和興趣

的工作可以大大增多。那末，除了廢病殘疾的人而外，凡人都願做特別有興趣有專長的事，凡人都願專做一種工作而願兼習一種以上的工作。這種社會，便是克魯泡金所懷想而不得的社會，因為在這一種社會裏面，才是像他所說的，「人人都是心力兩方面的自由工作者，個個心力健全的人都是勞動者，而且個個人做田間的工作也能，做工廠裏的工作都能。」不但如此，在這種社會裏面，凡屬衣食住行各項生活需要品，因為是科學的製造和科學的管理，都能做到像現在的馬路一樣，人人可以自由地公共享用，則凡人的聰明才力，不必盡為粗略的工作所消磨，而可以為高尚的文化和美的生產而努力。總括地說，我們由應用科學方法的生產，使一定做到應用科學方法的管理；由科學的生產和管理，使一定做到生產增加勞力減少的境界；到這個境界便是各人舒展其聰明才力而毫無物質的憂慮的一種最自由的世界。

(三) 生產品要如何分配到共享境界 分配問題，本源上要從土地和資本分配做出發點。但是我們已經說過三民主義的社會，是要把土地和資本的所有權削平，於是所剩下來分配的，便是單純地一個生產品的分配問題。本來，從根本上作一個總打算，生產品之分配，只有兩條可能的路線：一條是經過工銀制度的路線而生產品便由私人的賣和買當中分配了

出去；一條是廢除工銀制度而另造一條由政府或公共產業機關分配出去的路。因為祇有這兩條可能的路，便引起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之差異。嚴格的說，社會主義者由溫和派以至於馬克思派，都以爲人人須得勞動，不勞動就不得衣食。在這種制度之下，工作仍然是強迫的，雖然它是受國家的強迫而不是受個人資本家的強迫；一種相當形式的工銀制度仍然是存在的，雖然它的形式完全和現在個人資本制底下的形式不同。唯有無政府主義者則極力堅持根本廢除工銀制度的理想。他們的主張是一切生活需要的產品，都給社會上人人自由的享受，正如自來水的一般用之不竭的。克魯泡金在他所著『無政府共產主義』裏說：『不管我們這一世紀的商人生產怎樣引動公衆人的自利心，共產的趨向是不斷地湧現着，而且繼續地侵入到公共生活中來。從前收過河錢的橋，現在已爲不收錢的公共橋所淘汰；從前取過路錢的私路，現在已爲公路所銷滅。同一的精神，已表現在其他無數的新制度上面。博物館，公開藏書樓，義務學校，公園和娛樂場，修造如水平的而且有電燈照亮的街道，都是給人自由的享用；自來水可以供給到個人的住宅，而且不必問每人所消耗的水量究竟是多少的趨勢；公共電車及火車已開始採用賣季票的方法，或是繳納一種劃一的稅金這，可斷定它

還有更進步的可能，如果電車火車一旦由私有的財產變為公有，這一切都表明社會進步正是朝着一種什麼方向走的，而且可見進步是如何可能的一件事了。」克魯泡金認定無政府共產社會裏面，凡是生活需要品都可以無限量的生產，所以就可以任人各取所需。即是產額有限量的物品，如奢侈品之類，也要平均分配而不取資。所以無政府主義的分配方法，只是簡單的「各取所需」一句話就可以盡其全部意義。我們依三民主義的立場來觀察，無政府主義的分配方法是很可能的。像克魯泡金所舉的例證，有許多生產品確已達到「各取所需」的地步。如果科學再進步，許多其他生產品也一定會達到共享的境界。不過這種分配方法，根本上要靠幾個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三民主義當中已經有詳細的主張。第一個條件，要輸運和交通都由政府經營管理或監督，要做到這些分配的基本工具便宜而敏捷，然後自由分配才可以逐步達到目的。第二個條件，就是一切生產力要科學化，而且大規模的科學化，這已經在前段說過，不必再贅。第三個條件，除社會所經營管理的基本分配機關而外，政府和人民要盡量發展合作制度的分配組織，使生產品的分配全部歸於社會化，免除商人的分配制度。因為商人的分配制是以賺錢為目的，而社會化的分配制才是以便利消費為目的。中山先生的實業計

畫和民生主義，關於分配問題，總括起來，就是：要以科學發展我們生產的工具和條件，然後生產力增加到各種需要品都非常豐足的地步，一切上產品就可以分配到人人共享的境界。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生產條件和工具必須是科學的，生產力必須是科學的，生產組織和分配組織也必須是科學的。所以共享的世界，唯有科學才可以把我們引導進去，科學的進步愈快，我們進共享世界的速度也加快。我不相信工銀制度是唯一可行的生產品分配的路線，雖然在科學尚未發達的時候，工銀制度和商人分配的效用還於事實上不會完全消失。一般人以為金錢制度要消滅，各人因聰明才力之高下而得不同等的工資的現象也要銷滅，才是真正的共享，但是如果生產分配都能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則人類不須做苦工而可以得一切物質的滿足，只須各盡所能，而可以各享所需，那就已經達到共享的目的。

以上三點，依經濟組織方面共有共治共享的意義，說明三民主義對於經濟上的實行方法。將三民主義對於經濟改造和政治改造的方法總合起來，則除上述土地和資本方面的共有，生產組織方面的共治，和分配組織方面的共享這三種意義外，我們不可不回復到三民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共有共治共享的意義，而具體地作一個總結論。我們以前已從原則上分析三民主

義的連環關係，但是經過上述經濟方面具體方法之說明後，我們在下面就要從實行方法上來總合三個主義的連環性，而舍去我們所已考慮之各種主義理論上之比較的批評。

在一切實際問題的考慮之中，我們所不惜反覆估定的，就是軍閥主義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所結合而成的帝國主義的環境。我們的革命，開始即要衝陷到這樣連結而成的帝國主義的壁壘裏面去。要想衝進帝國主義的壁壘，把它的三個柱石各個擊破，所以就不能不有一個相當連環組合的三民主義。這並不只是說，用民族主義去打破軍閥主義，用民權主義去打破官僚主義，用民生主義去打破資本主義，就可以根本推翻帝國主義。不是這麼單純的。因為軍閥主義是連結了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而造成的，官僚主義是連結了軍閥主義和資本主義而造成的，資本主義是連結了軍閥主義和官僚主義而造成的。這三個反動勢力，缺其他二個，便不足以構成其一個。因此，三民主義所以能把這三個反動勢力打破，不單單是以這邊一個革命的主義去打破那邊相對的一個反革命勢力，而是以三個有互相連環性的革命主義，才可以打破三個有互相連環性的反革命勢力。所以在革命的壁壘裏面，民族主義是要靠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連結成功，民權主義要靠與民族主義民生主義連結成功，民生主義要靠與民族主

義民權主義連結成功。這三個革命主義，拋棄了一個，便不能成就其他二個。有了三個連環的革命主義，才可以擊破三種反革命勢力連環結成的帝國主義，才可以創造一個替代帝國主義環境的三民主義的世界。

這一個根本立場，是三民主義的實行的一切步驟和方略之所從出。我們最初的革命方略，以前第一步定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不料做到推翻滿清之後，建立民國是只做到一個空名，平均地權就完全沒有這回事。所以孫中山先生後來就說一切的失敗，都是不實行革命方略之過。我們現在的革命方略，仍是孫先生所定的革命方略，而依此方略所定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等，內容更經先生一人盡了畢生的精力完成了。依先生之所昭示，我們對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建設，必須同時並進，決不能任意利用一部分而拋棄那一部分。誠然以三民主義之無所不包的這種博大的革命主義，無論何人，都能割取其中一二點以為騙取政權的工具，但是割取一二點而成的政治運動，決不能成為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孫先生逝世以後，中國革命，已流為破片的三民主義之革命，而非整個的三民主義之革命。我們以後要繼承先生的遺志，非用全力恢復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不可。如果

不然，大家只是割裂三民主義的片段，互相拿來策略化或手段化，結果一定祇見若干反革命勢力各爭雄長，決沒有整三個民主義的革命一氣完成。所以我們此後的責任，不僅在於固執三民主義各個的原則，尤其在於堅持三個主義同時的實行。於此，三民主義連環實行的方法，乃今後進行革命最當注意的事。

孫先生規定了革命的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在這三時期之間，本不說是三民主義中那一個實行在先，那一個實行在後，祇教我們在進行革命的時候，去認識三民主義中那一件事和那一件有同時實行的必要，就依着步驟去做。然而我們至少也究竟要明白三民主義當中各個設計畫和政綱互相連帶的關係，才曉得那些是應該先做那些是應該同時的做，那些是應該分別的做。我們在軍政時期，開始做打倒軍閥的工作，當然非有革命武力不可。但是專靠武力就能打倒軍閥嗎？如果不從地方扶植民權的基礎起來，即使軍閥倒了，就能擔保它不再生嗎？這就曉得以革命的武力去北伐，和以革命的黨員去指導地方人民做行使民權的準備，二者在打倒軍閥上各佔一半的意義。但是打倒軍閥，固然是實行民權主義的第一步，而軍閥所藉以爲後援的帝國主義，不能不同時解決它，解決它的第一步，就要斷絕軍閥和帝國

主義的政府間之結合，這已是引到民族主義的關係上面去了。但是要斷絕軍閥和帝國主義間的結合，於民族主義的意義上還要根本廢除從前一切不平等條約。此種不平等條約，乃帝國主義所藉以利用中國軍閥官僚從事內亂的門徑。同時，外國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亦藉不平等條約為根據。所以不平等條約之廢止，不獨在民族主義觀點上當如此，並且在民生主義觀點上尤當如此，因為以後發展國家的實業，鼓勵個人的企業，都須有待於各種在條約上已失的經濟權利的收回。但是要在民生主義上做到收回各種經濟權利，必須革命的政府能夠確實樹立整理內政的基礎，換言之，就要在民權主義上掃除積弊，如官吏之貪婪，差卒之勒索，鴉片之流毒，抽捐之繁苛，都能一概掃盡，尤其要能規定公共度量權衡，製定訓練民衆團體的方案，確定民衆團體在縣自治之下的基本組織之完成，以及開辦各地自治的市政，才能取得外交上的威信，使外國無所施其抵賴而將各種不平等條約上經濟利權久假不歸。總括地說，軍政時期，於破壞方面，在民族主義的意義上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國內經濟能力發展之自由的地位，而截斷軍閥與帝國主義間的連鎖關係，在民權主義的意義上，要打倒軍閥政治，掃除一切傳統的弊政，禁止官邪，剔除公共機關營私舞弊的陋規，杜絕胥吏差卒的勒索，在民生主義

的意義上，要廢止一切苛捐雜稅，防止高利盤剝，嚴禁一切以個人地位或團體勢力及土匪強盜魚肉人民的行爲，使共產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土匪都不得凌虐一般的民衆；於建設方面，在民族主義上，須喚起民衆對於中國民族目前經濟的地位和政治的地位之危險，和將來民族獨立所必須共同努力的方向，同時於可能的範圍內，分別實行本黨所定的對外七大政策，在民權主義上，須保障一般民衆團體組織之自由，而使之實行「民權初步」所具有的社會建設，并以法律和政治的力量造成民主自治在地方的真實基礎，而永遠杜絕官僚政客的勢力之再生，在民生主義上，須調查過去社會各方面的經濟狀況，施行社會測驗經濟測驗土地清丈人口統計，扶植各種合作事業，宣傳農工業之科學的生產方法和組織，提倡保護國內的新興工業，保障農工改革財政及商業金融的制度，并籌備公共濟貧救災的事業。如果軍政時期內能像這樣確定三民主義的指向去努力，則革命的軍人就不至變爲「新軍閥」，革命黨員不至變爲腐化惡化，整個革命的勢力就不至力量向內部互相抵消。

到了革命的武力完成統一之後，軍政時期所應做的工作，都做好了，才談得到訓政時期。這兩個時期的過渡，事實上固然不能如白紙上劃了一條黑線一般明顯，但總要革命的權力對

內對外都鞏固了，縣自治所有訓導直接民權的工具或條件都齊備了，民衆也組織好了，人民所受過去制度風俗習慣和弊害的痛苦也解除多少了，然後訓政時期才展開。以革命的總過程來說，訓政時期是最緊要而最嚴重的時期。因爲一切建設的事業，都是這個時期內立下深厚的基礎。對於以前的軍政時期，要緊接得住，對於未來的憲政時期，要開創得穩，所以訓政時期實在是繼往開來的最重要關頭。在這個時期，我們於民族主義方面，就不能單簡地專從外求上求淺薄的零碎的好處，要從內部建設上充實我們民族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如果內部組織有了成績，便是民族對外的大力量。內部建設的步驟，我主張要採用經濟上「分工合作」的意義，確定各省於軍事上「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由各省長官負責實施「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內政策」的全責，而由中央策勵其成績。詳言之，各省必須於民權主義方面，對於地方要提高人民的政治知識和能力，這就是要訓導人民以行使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複決權的知識和方法；對於地方政府，要有「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察衛生各種事項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得有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

義務，誓行革命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對於與縣自治完成有連帶關係的政策，如「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釐訂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之窮，」「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之完全自由權，」「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并保障其獨立，」等等政綱，均須與中央協力合作的實施起來。於民生主義方面，必須於縣自治開創之時，「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同時必須確定凡「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至於「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與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當各省負責實施這種政策之際，中央則必制定關於縣自治的訓政法，選舉法，勞工法，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地價稅法等，以謀訓

政上之統一，黨則必領導全國人民走上真實建設的途徑，引起各項人才的事業心，使全民族在實際工作上事事能夠求最大的效能，而矯正一切務虛榮而不務實際，只知盲目地活動而不知集中精神能力以求一件社會事業之成功的惡習。如果黨與政府及各省負責同志和民衆都能向訓政的大路共同努力，那麼一切革命過程中所有的困難，都能逐一打破。因為天下事，不進就是困難叢集，進則一切支節就無從橫生。現時革命所以流為非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其原因固然有其他非人所期的過去事實造成了一半，但是各省經過軍事底定之後，不知緊接做訓政工作，也居一半。如果各省同志負責實施訓政時期的工作，則黨的精神和力量，就能以實際的建設，去銷滅一切無聊的紛糾微菌。但是這能候，趕緊着手做訓政的準備，還是不遲。因為民衆正是希望着，等待着，唯恐時局不由軍政時期而展入訓政時期，只有天天看各方互逞小刀細工的權謀術數，那才使民衆生厭。在現有知識的民衆，確是如此的心理。我們革命而不向民衆所期望所心向的光明之路前進，則縱使全國的軍事上成功，革命還是要失敗的。反之，能於各省軍事過渡期間，即着實施行訓政計劃，則不必待北伐之完成，而革命建設的風氣，必能預先傾動全國的人心，確定革命前途的勝利。

訓政工作既然有了相當成效，於是相因而至的便是憲政時期的開始。那時候，在民權主義方面，必須從縣自治的直接民權的基礎上，樹立中央五權憲法的政府。憲法未起草以前，必先依照建國大綱的原則，檢查訓政時期的成績，如一省之內，是否「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的程度，是否可以組織「國民代表會，選舉省長，以為本省自治之監督，」各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是否能行使「直接選舉官員之權，直接罷免官員之權，直接創制法律之權，直接複決法律之權。」迨全國有過半數的省分，確有依照建國大綱辦理縣自治的成績，而入於憲政開始時期，則憲法即可本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的成績而着手起草，并開國民大會決定而頒布之，同時關於中央統治權如何行使，地方與中央權限如何分配等問題，悉當依本民權主義建國大綱及實際需要來規劃清楚。在此時期，民權和民生的基礎，經訓政程序之後必已鞏固，所以最重要的工作，在於完成五權憲法的國家組織。只要國家的組織完成了，然後大規模的「實業計劃」纔能合國家與地方的力量逐步來發展。

總合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步驟，我們須得認識幾個深大的意義。第一，一切破壞和建設，是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作的，不是為逞個人或階級間的私憤而作的。在破壞時，我們要打

倒軍閥，爲的是要除去民治的障礙，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爲的是要除去民族和民生兩方建設的障礙。離開了三民主義的意義，一切破壞便是造「亂」。我們革命所以能夠把社會已成的風俗習慣制度和人物加以罪名，完全是由於用了三民主義去鑑別風俗習慣制度和人物，而詳細審判過那些是三民主義的障礙物，那些非三民主義的障礙物，是障礙物的，便要破壞它，非障礙物的，便撇開它。我們的軍隊打仗，不能說因爲我們是軍人，就要把一切非同類的軍人通通殺死，或把一切非軍人都來殲滅，天地間斷然沒有這樣的道理。我們開調出去的時候，打仗是從非軍人當中認定一部敵人去打，是從非同類的軍人當中認定一部真正的敵軍去打，斷沒有逢人必殺逢軍必打的怪事。同樣地，革命只是破壞實行主義的障礙物，而不是要把一切文化和制度，不分好壞都一齊毀滅的。到了建設的時期，亦復如此；我們要認識那些是主要的建設，主要的建設我們負責作起來，其他次要的建設，就自然有人會跟着作起來；那些是應該建設的，應該建設的我們作起來，不應該建設的就不要枉費精力財力，而就攔了正當建設事業。這許多話，歸到一個原則上，便是我們破壞也好，建設也好，都要死心塌地依照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和計畫去做，不能添加一分，不能減少一分，要是逞個人的奇才異能，來獨出心裁，妄事增減，事實

上只有勞民傷財的結果，而終久還是要讓孫先生手定的主義和計劃來把你剔除。這是第一個意義。

在實行三民主義和其計畫上，我們要認識，實行的出發點是整個中國民族，不是那一個或那幾個個人，更不是那一個團體或那一個階級。民族是超越一切的力量，在政治的觀點上如此，經濟的觀點上亦如此。由實行的力量說到實行的方法，則科學是超越一切的方法，在理論上如此，在事實上尤其是如此。我們三民主義者，如果不承認民族是超越一切的不承認科學是超越一切的，那根本上就是三民主義的叛逆者，更說不上來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作什麼工作，出什麼力量。我相信無論任何個人團體，任何學說，凡蔑視民族的，蔑視科學的，都是被自己民族的力量壓倒，都是要被現實科學的力量壓倒。我把這些話歸納下來，又即是：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只是非科學的哲理，即自命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不能逃出例外，它們所以只成為哲理，是因為科學的進步把它們原有的內容逐漸排壓到哲理的空想的地位而去；至於它們的目的，唯有民族的力量加上科學的實施才能達到；三民主義所以十二萬分自信可以達到它們所共懷的目的，完全是信賴民族的力量，和信賴科學的方法。所以在中國革命

的過程上，我們能否由起點奮鬥到終點，完全靠我們能否喚起我們民族生出大力量來應用科學的方法，把我們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然而這又要靠負革命責任的同志們，信賴自己的民族，信賴現實的科學；個人的力量，要向充實民族力量這一方面努力，個人的智力，要向科學這一方面去發展；如果自己沒有充實民族力量的可能，沒有追求科學智識的可能，那至少要虛心扶植有這種力量這種智識的青年們來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如果自己又沒有這種虛心，那麼革命前途是無希望的，民族前途是再不見有光明的。這是第二個意義。

總理手定的實現三民主義的程序和計畫，本身是有科學的定的基礎，但只是備具了一種博大的綱領，而其細節是須一般志們和專門人才的補充，而且要在實施之際隨客觀的需要補穩充。因為如此，所以三民主義之實現，細節上不能單憑學理同的成見，要靠實際的考驗。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拿實用主義的精神來鼓勵全國各種人才為三民主義之實際努力，要以思想落實際觀察務真切做事求效能三個要義訓導後起的青年，要以破除一切從個人主義權謀主義愚民主義出發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道德，澄清全國的空氣。玩弄虛玄，戕賊人才，愚弄民衆，都是三民主義實行上的最大仇敵。這是第三個意義。

千言萬語，也許總不抵下面這個總意思：人是社會的，生存努力的基礎，總須得從博愛起點，經由三民主義的各個人總合的途徑，而底於大同世界。本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東西，與其說是思想，莫如說是力量。因為由亙古以及於無窮的將來，這三個力量實在是人羣歷史的發動機。孫中山生先在人類文化上所佔的一個中心的地位，就是在於首先發見這三個力量是推進入羣歷史的力量，而總名之曰進化的重心，更由發見這三個力量而定出一個經由此三個力量連環紐結的總計劃，去指示人們向世界大同的目的大踏步前進。在朝着世界大同這條大路前進的時候，人類所賴以燭照前路的，不是武力，不是金錢，不是權謀，不是宗教，不是哲學，而是科學這個唯一的火把！三民主義的信徒們，要大家提着科學這個火把來革命呵！

六月十六之廻顧

一、陳炯明反對北伐

當陳炯明率粵軍回粵的時候，總理在上海，曾用全付的力量幫助他。等他到了石龍，他就不想請總理回粵了。却因為當時趕走岑春煊一班人，陳炯明自己又不敢獨立，名義上非

恢復總裁制不可。於是他發電報請總理及伍秩庸唐少川諸人，在上海辦事。總理不答應。等總理同伍唐諸人既到了廣東，後來唐繼堯也就到了。總理以為事權不一，諸事不能進行，主張將總裁制改為元首制，陳炯明就竭力反對。他為什麼竭力反對呢？因為他心裏深怕總理一做了總統，必定就要舉兵北伐；舉兵北伐，他就要失掉北洋軍閥的歡心，這是他所以反對的原因。當時唐少川對於改總裁制為元首制這回事，是模稜兩可。但伍秩庸先生却竭力贊成，結果非常國會行選舉於廣東，元首制實現。孫先生就被舉為總統。唐繼堯首先跑到香港，又由香港得到陳炯明的資助，轉歸雲南去了。

孫先生既做了總統以後，不到幾個月，就派陳炯明去征伐廣西，從西江出兵至南寧，所有作戰計畫，皆由蔣介石同志為他定好。攻克南寧之後，他電請介石赴南寧。這時適趙恆惕在湘攻鄂未成，態克武在川討吳佩孚失敗，許汝為部及李協和所統率的滇黔贛各軍，均在桂邊境，因此李協和竭力請總理北伐，總理遂由梧州至桂林督師。先是，介石接了陳炯明的電約，就到南寧去看他，不料介石一見了他，他就表示反對北伐，並且說：「民國二年，展堂一定要出兵反對袁世凱，實在害了我，如果那時不反袁，廣東由我幹到現在，豈不什麼都辦好了嗎？」

一 介石

聽了這話，即刻就說：「我現在頭痛，」於是就起身辭別，馬上回廣州，出香港，往上海，後來到了上海，接到 總理的電召，於是又過赴桂林。 總理這時電催陳炯明出兵，而陳炯明在南寧逗留不進，想出種種計策來阻撓北伐，並說：「要北伐，須給我六個月的準備。」 總理不允，陳炯明無法，就轉請我與 總理講，總理還是不允，如此遷延下去，不覺已過了六個多月，他也并未準備，更講不到北伐了，於是他又想出種種難題來難 總理，他說：「要北伐非先籌一千萬元不可，」同時又說：「我祇担任粵軍的餉糈，滇黔軍的餉糈，由滇黔兩省自備，贛軍的給養，由廣西担任。」他雖提出這多許難題，但是並不能阻止 總理北伐的勇氣。 恰巧在那個時候，趙恆惕派袁某來請 總理到湖南去，並請 總理每月助湘省軍餉十萬元，外請幫助子彈一百萬發。當時 總理命陳炯明照辦，陳炯明於是又掉槍花了。 他外面雖承認湖南的餉彈，他暗中却與趙恆惕相約，拿不許 總理到湖南去做供給餉彈的交換條件，所以趙恆惕一方面陽為歡迎總理到湖南，一方面又假造出地方團體名義來擋駕，更進一步，就叫湖南各將領都聯名擋駕。 這時 總理尙留在桂林，我與介石，汝為，益之，協和等人，俱常在 總理左右，大家深知陳炯明已有叛逆的徵象，不過為大局着想，總想挽回，不便破裂。 陳炯明每有電來，其中有措詞強橫跋扈不堪的，我總不

肯將原電給總理看，僅拿電中的大意告訴總理。但我不願意見好於陳炯明，總沒有使他知道。

二、刺殺鄧鏗

鄧鏗字仲元，是陳炯明的參謀長，兼粵軍第一師長。他是深明大義，一心擁護總理。陳炯明因為他曾挑選第一師勁卒六百人充當總統府衛士，對他非常不快，後來許汝為請發子彈百萬，鄧又批准八十萬，於是陳炯明更恨鄧入骨，鄧之死機，也就埋伏在這裏面了。在鄧未遇刺之先，有一個姓林的——台灣籍——來找許汝為，告訴他說：「陳炯明的兄弟陳覺民來問我，（林某）有沒有暗殺手段對付鄧鏗，我不敢答，我現在可不可以告訴仲元，我話已說過，以後如出甚麼亂子，可不與我相干。」林某說過這話就走了。後來許汝為就拿這話告訴仲元，仲元却毫不以為意。不久仲元就遇害了！先是陳炯明有個暗探長黃福芝，因私販煙土，仲元要嚴辦他，陳炯明極力替他緩頰。等到鄧既遇刺，却一定要將這件案子，交給黃福芝全權辦理。後來辦了好久，總不能有一點眉目。鄧鏗被刺，凶手雖至今沒有獲到，然而從上面兩件事看來，誰是主便之人，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八九分了。當這個噩耗傳到桂林的時候，我同許蔣諸

同志均在 總理面前大哭不止。

三、總理由桂回粵

鄧既遇害，後方更無人可以信賴，所以汝爲同志主張回兵，介石同志却主張討伐陳炯明。總理講：「此事可問展堂。」我就對 總理說，前爲大局計，凡事都取寬容，今競存竟如此，自然回兵。」總理遂決計回兵。此時前方已過全州，總理於是下令全體動員回粵。我們由桂林起程，回梧州的那一天是四月初八。一到梧州，總理即召集軍事會議。總理說：「我們已經沒有後方了，在桂林時，沒有後方，現在到梧州來，也還是沒有後方，我們就只有以廣州做後方，從韶關出兵。」於是大家都贊成 總理這個主張。到了四月十二，大軍已到了梧州。原來從梧州至桂林，上水非十餘日不可，下水却只要四五天，就可以到了。陳炯明想不到我們回兵有這樣快，於是慌了手脚，立刻來電問我，總理是否班師。我就復電說：「我們既不能前進，自然回兵。」大兵才到梧州，陳炯明早已派廖仲愷同志來迎接。同時，陳少白也來了。少白本來同曹亞伯一起隨從總理到桂林去的。他在桂林時，總是說陳炯明如何如何的不好，總理聽厭了，不久就叫他走了。現在大兵回到梧州，他又從廣州來說陳炯明是如何如何靠得住，如

何如何披肝瀝膽相信他。總理說：「他總不能教我不革命。」總理此時憤恨已極，想將他的總司令，陸軍部長，內政部長，省長等職，一概免去，我以為操持過急，怕生變動，不若先將他的內政部長及省長兩職免去，同時黃大偉魏邦平力勸總理息怒，我並勸陳來見總理，自己認過，聲明並非違抗命令。照總理素來待人寬大的胸襟，定可以不咎既往的，但是陳的左右，阻陳不來，於是陳就不敢來。等到第三天，陳還不來，由介石同志下令進兵肇慶，並派伍廷芳担任內務部長兼省長，仍留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及總司令。介石同志令大兵由肇慶進逼三水，陳炯明就逃到惠州去了。三水既下，介石同志見到軍事上陳炯明已不能抵抗了，於是離開廣東，返上海而去。這時楊文愷魏邦平二人就電請總理回省，總理遂由三水回到廣州。

四、陳炯明公然謀叛

總理回到廣州以後，立刻整頓兵馬，親率滇黔贛各軍，匆匆北伐。陳炯明乘這個機會，調廣西兵來搗亂後方。並利用關國雄扼守梧州，派葉舉及熊略等人，先後將省城外而的高地及各要塞占領。當他們軍隊原分南路西路回來，到了西江，沒人阻擋，他們就用船運兵。這時候海軍尚一致擁護總理，總理可以用海軍去攻他。但總理此時只顧北伐，毅然率軍前進，不

多時就克服了大庾嶺，南康，龍南，平南，定南諸地，一直到了贛州。陳炯明在後方搗亂不算數，同時又勾結了萬惡的軍閥吳佩孚，陳光遠，造成「請南孫北徐（世昌）同時下野」之謠。將總理與那乞憐於軍閥的徐世昌相提並論，其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時廣州已入陳逆掌握之中，刻刻派人至財政部鬧餉。廖財部長被逼不過，想請總理由韶關回省，我與惠生同志力主不可，我說「回粵有三害：（一）總理回去定受包圍；（二）如受包圍，消息就要隔絕；（三）如陳炯明竟不聽命，前途就更不堪設想。」總理說「我不怕他們。」馬上回省，命我留守韶關，汪精衛及覺生同志等人，多勸總理恢復陳炯明一切軍權，總理不肯。陳從惠州來電說「我是服從總理的，不過要總理把左右文武佞人清除」云云。總理接到此電說「競存這樣，那裏是服從，簡直是和我作對。」總理又在省城演說，誰要叛逆，我就拿飛機擲炸彈攻他，可以致他死命。」其時惠生同志來一電給我，說這一次演說，不知有甚麼影響，那裏知道這六月十六日的大叛亂。總理兩個月日在驚濤駭浪之中，彈雨槍林之內的大豪難，已將爆發，不可幸免了。介石同志，於是就在驚濤駭浪之中從上海跑到總理的左右來。

五、總理豪難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是總理蒙難的第一日，那個時候我尙留守韶關。到了十六這一天，省城的電報忽然不通，火車又斷，我曉得不好了，一定是陳炯明謀叛了。所可稍慰的，就是他們把鐵路拆斷，還有怕我們回兵的意思。我就用無線電打聽消息。聽了一日，只聽到兩件事。（一）某報訪員發電到香港說，「孫中山的陸軍已無力量，本人失蹤。」（二）海軍部長湯廷光電軍艦上說，「海軍南來，本爲人民謀幸福，萬不可向省城開砲。」我根據這兩個消息，推測的結果是：第一陳炯明已反；第二總理尙無危險，並在兵艦中。後來曉得這推測的果然不錯。到了第二天，又聽到鐵路總局發出來的電報說，「鐵路業已修好，各局職員不要走開，局長已換新人，明天就有車開出。」我由這個消息看來，覺得情形不好了。因爲他們既把鐵路修復，足見他們已有餘暇來對付我們了。我於是召集了一個會議，結果大家覺得祇有三種辦法。第一種是帶兵打省城。無如留守韶關的，不過二百多人。第二種是仍然堅守韶關。第三種是向前進。結果決定前進。於是我就帶了十個人先行，張發奎帶二百人隨後出發。

我們用兩隻小船上駛，我同金庫庫長林雲陔同志同一隻船，其餘的人同一隻船，船行到離韶關五十里光景地名大橋的地方，已經傍晚，當晚停船。第二天一晚就下大雨，水漲船不能行，

乃等一天，我好像記得那一天是十九，留城二電生，就用電報和我們船上通消息，說：「敵兵已經進城。」我們接到這個消息，本想即刻開船，無奈船不能行，所以我們只得拖棄我們的行李乘舟登岸，一路上扒山越嶺，好容易走了兩日，才抵始興。第三日抵南雄。到了南雄，就曉得敵兵已佔始興。於是我們越過大庾嶺，走南安。時協和病在南安，我們都沒有來得及看他一下，就由南安到南康，由南康到贛州，到贛州的那一天，已經是廿七了。即夜在汝爲同志處召集會議，汝爲、益之、任潮、登同、懸忱、諸同志及彭凌霄、梁鴻楷等人都來參加，我就把經過情形報告，並因爲我在南雄看到報紙，也附帶把省城的情形，及伍秩庸同志因亂軍受迫而死，廖仲愷同志被誘囚於石龍，一一報告。等我報告完畢，汝爲就問益之的意見，益之說：「我們奉天大元帥命令北伐，如大元帥有了危險，我們無論如何總要回師討逆；登同也說：「我們只知道有大元帥，不知其他。」

梁鴻楷始終沒有說話。彭凌霄就說：「回兵討逆當然衆無異詞，惟以背進，後方空虛，大犯兵家之忌，大家回兵則以贛軍留守贛州爲妙。」汝爲問大家「餉有沒有辦法？」我說：「大元帥曾派黃昌穀帶二十多萬元到南安設金庫，我這一次從南安經過，已把這一筆款子帶來，」散會後，我就同汝爲簽字發餉，每軍發五萬，只有贛軍因爲他僅留守贛州，發了三萬。我們才把

餉發完，胡懸忱同志就來對我說：「梁鴻楷的軍隊怕靠不住，還是把他留在贛州和贛軍一同留守的好。」我就把他的話告訴汝爲，汝爲說：「你同任潮商量。」我就去問任潮，任潮說：「第一師是決不會肯打陳炯明的。」我說：「那麼我們就留他在贛州。」他說：「他們現在已決定回去，叫他們留也怕不容易罷。」這個時候已是深夜兩點鐘了，我看任潮沒有辦法，只得等到明天再說。那曉得一到天明，就有人來報說，梁鴻楷與朱益之的軍隊都已經出發了。我當時還當着他們是願意先行，也就沒有追問。不多時黃大偉由泰和忽派人來勸我們先打下江西來再說，不要回兵，汝爲對來人說，這麼不行，我就寫了一信付來人帶去，信中的大意就是說大元帥現困兵艦中，我們不得不回兵去救。第二日我們就由信豐這條路出發，汝爲的參謀打電話來說：梁鴻楷僱伙子往梅縣去了，我就打電話把梁鴻楷，接電話的却是李任潮，他說梁鴻楷已決定往惠州，恐怕是沒有辦法挽回了。我叫他等我，他即應允，我就馬上去會他，到了他那裏，才曉得梁鴻楷之往惠州，是因為他的三個團長一個師長的主張，其中以陳修爵徐漢臣兩人的話爲最有力。我就對任潮說：「我們不如也隨着他們上梅縣。」他說：「這也是一種辦法，但我已犯了嫌疑，不好做你的參謀，還是請你同軍長商議，事情總要決斷得快。」我就問汝爲並把隨着他們到梅

縣的理由說把他聽：「一，陳軍的堅銳現在韶關，我們不往韶關而往梅縣，正是避堅之計；二，第一師在前，我們在後，如他們同第一師打，不啻逼第一師做我們的先鋒；三，他們如不同第一師打，我們就可以一路跟着第一師回惠州。汝爲不以為然，他也把他的理由講把我聽。他說：「他已同滇軍約定合攻韶關，滇軍做右翼，他與福軍擔當正面，如粵軍竟分道而行，滇軍必生疑心。二，李福林的軍隊太弱，如我不加入韶關一路，李軍就變爲無用。三，由東江到省城究竟路遠，總理現在兵艦受難，我們應當抄近路走，而且海軍怕靠不住，所以還是以向韶關爲宜。」我聽到他說：總理現在兵艦受難的話，我就不顧一切，決計向韶關了。後來會見 總理的時節，我們提起前事。總理以爲如若我們照原所擬的計畫而行，倒反成功了。我們決定了之後，還是由信豐到南雄，敵人則由始興退大橋，我們由南雄出發，就以滇軍攻韶關帽子峯，第二軍和福軍攻敵正面，不能進，汝爲親自督戰攻火山，我留守始興，爲汝爲料理後方事務，攻韶關十餘日不能下，黃大偉也來了，聽他的部下說，他是因爲大元師下令調他回兵，他的三個旅長也得了大元帥的命令，逼得他沒有辦法，他才來的。汝爲就請他參加打韶關，他不允，他要打翁源。但其時張民達已攻下了翁源，他以爲向翁源，就可以用很近的方法往省城，汝爲說：「只要你肯幫忙便好辦，

你就由火山打翁源罷。」他於是就帶了六營人前去。看見汝爲所部同敵人血戰了一晝夜，他竟又把六營人帶回來了。當這個時候，陳嘉祐的兵忽來參戰，他並且派了一個旅長叫做譚蒙，只帶了一營人出戰，這位旅長滿口驕話說：「陳炯明的兵那裏夠我打。」那曉得這位譚旅長一上去就敗得不可收拾，他這一敗不打緊，把粵軍全部都牽動得敗了下來，汝爲這個時候在火山，他的後方在周田，登同在大橋，汝爲不得已一面招呼登同退周田，一面打電話給後方，叫後方快用駁殼來制止敗下來的軍隊，我就使護弁隨林赤民等數十人去制止他們，那知他們一退下來就睡倒不起，從下午四時起，直到深夜二時汝爲才回周田，因爲他最後自己才退的，汝爲一見我就說：「展堂先生，我們有些倒霉！」我看見他的參謀長譚某手上用布裹起，我就問他說：「你打傷了嗎？」汝爲答道：「他是自己不小心，手槍失了火，現在還不要緊，且等李福林來商量。」

等李福林來的時候，已是三點鐘了。大家商議仍請譚蒙整頓一下去守周田，他慨然而去，天還未亮就有人來報告說：「譚蒙全部已向左轉由樂昌往湖南去了，並拐了李福林一個支隊去了。」汝爲於是決計退兵，我就與二衛士從周田大營趨八十里到始興，汝爲退回江口，江口離始興二十里，我打電話把他，問他：「回始興不回始興？」他回說：「我預備在這裏佈防，併計劃反

攻，你在始興無事，何不到南雄去看？」我到了南雄，聽見說沈鴻英已到南安，黃大偉的三團兵有一團兵尙留在大庾嶺的，已被沈鴻英打散，我想沈鴻英既到南安，南雄必不能守，適羅翼羣徵服由廣州繞汕頭，梅縣，信豐，經南雄到江口，見汝爲，他打電話來請我，想和汝爲定計去打梅縣。我就又由南雄回始興，誰知適值遇王懋功從翁源斜刺裏敗回始興，說「黃大偉三個統領部潰散了兩個，」他自己剩得十幾名兵，我立即打電話把汝爲說：「現在既不能前進，且前進愈危，須趕快退南雄。」他說：「你就快通知登同罷，」我即覓福林，隨後就和他的軍隊退馬矢坳，同日汝爲也趕來。我們由馬矢坳到南雄，因共往病院去看協和，協和雖病，精神還好，大家皆言南雄不能守，他主張到湖南，汝爲主張到福建，我說：「現在到底走那一條路好，非常難料，與其大家走一條路，設或走不通，就沒有辦法了，不如分道進行各碰機會的好，不過我論理還是同汝爲他們一路走。」於是協和就領兵往湖南，汝爲因有一部份人尙在翁源，他就同登同率所部從江西到福建。我就隨他們由龍南，定南，筠門嶺，會昌，瑞金，到福建界，再由汀州小桃坐小船到延平，每到薄暮船就停而不行，且船伙均不願舟中人而離船登岸。一遇天雨，船伙均一手打雨傘一手撐船，這還不算爲奇，最妙不過，是有一天路遇一盜窟，船伙大聲呼喊，我們不解其意，據他們說：「這是

強盜窠，我們呼喊，是招呼強盜的意思，強盜出來不出來，憑客人的運氣，如若我們不打強盜的招呼，強盜曉得了，我們下回就不能從此經過了。」我們在延平住了二日，與王永泉約好同汝爲通消息合作，我就從延平到福州，在福州得到兩個消息：一就是總理已到上海；一就是仲愷已經恢復自由。我於是由福州搭船往上海，到了上海，才看見總理。

中山救國全書

三冊 一元二角

三民主義淺說

一冊 定價五角

建國方略

一冊 定價七角

民權初步

一冊 定價五角

五權憲法

一冊 定價一角

建國大綱

一冊 定價一角

國際問題草案

一冊 定價三角

不平等條約

一冊 定價三角

中國國民黨宣言及決議案

一冊 定價四角

第一次全國大會宣言

一冊 定價一角

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一冊 定價一角

孫中山倫敦被難記

一冊 定價三角

汪精衛最近講演集

一冊 定價三角

孫中山先生小史

一冊 定價八角

蔣介石先生小史

一冊 定價一角

農民協會章程

一冊 定價八分

農民政策

一冊 定價一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再版

黨國要人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全書二冊定價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輯集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漢口 廣州 北平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遼寧 長沙 梧州

鼓樓 中街 大南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A541 212 0018 2297B

◀ 黨 化 叢 書 ▶

中山救國全書

三册 一元二角

此書集合孫中山先生所著各種救國論著彙為一編凡我國人俱應備
此一卷封面用彩色書面紙襯以三色版印孫先生照相尤為精美絕倫

三民主義大綱 一册 一角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册 一角

國民黨組織法 一册 一角

國民黨的歷史 一册 一角

上海 大東 書局 發行

